

※ 文哲論壇 ※

天道、治術、商品：《忠經》之出版 與明代忠文化

劉瓊云*

一、前言

本文始自一位文學研究者的困惑與困難。檢讀明清之際文史材料者，鮮能不遭遇關乎「忠」之言行、議論。殉節忠臣的傳記，貳臣的追悔自白，遺民守節的相關言論做為，朝廷、地方對忠節之士的旌表儀式，透過舞臺戲劇表演凝聚的忠臣形象，抑或小說如清初《豆棚閒話》藉改寫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揭露「守節」之舉背後的沽名算計，乃至佛門教說¹；可以說關乎忠節的書寫、言行，無所不在。

然而「忠」在當代又是一個牽纏格外複雜，有時甚至充滿問題性的道德條目 (problematic virtue)²。姑且不論此一概念在儒家思想脈絡下，隨時代不同有所變化的

本文蒙科技部補助 (101-2628-H-001-003-MY3)，從發想到完成，中研院文哲所楊貞德、劉苑如兩位研究員，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朱冬芝不吝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筆者持續對話，給予鼓勵；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修改建議，使本文論述更為清晰縝密；並得國家圖書館授權使用館藏《忠經》善本數位影像；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 劉瓊云，本所助研究員。

¹ 廖肇亨：〈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佛門節義觀論析〉，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思想中的情、理、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年），頁199-244；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

² 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 George P. Fletcher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進行的思考，來理解「忠」此一道德條目的複雜性。他指出，一方面忠是政治生活的開端，在政治生活中，與他人互動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藉之能使眾人公益戰勝自利經濟算計。另一方面，忠於某一對象導致強化認同，區別敵我，乃至由於非理性情感過度高張。從「忠」而衍生出之大惡，便是戰爭。George P. Fletcher, *Loyalty: An Essay on the Morality of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意涵；在明清之際忠臣、遺民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歸納「盡忠」一事，在當時至少牽涉儒家自個人修養推及治道的道德及政治理想³，君臣在實際政局中的操作、實踐，社會普遍的公眾議論⁴，以及文學書寫、展演的形塑力量。「忠」之觀念，在當時已是道德、政治、社會、文學交互作用的場域；換言之，此時期關乎忠之言說、實踐、乃至藝術呈現，更宜於從「忠文化」的角度觀之。

相較於明清時期「孝文化」所得到的關注，「忠文化」之研究相對益少⁵。此一現象或許又與「忠」觀自傳統進入啓蒙現代的曲折有關。眾所周知，《孝經》之教涵蓋忠觀，以「事君」為「事親」之延伸。晚明纂輯《孝經大全》的呂維祺(1587-1641)即曾言：「《孝經》，孔子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⁶呂妙芬考察明清至民國時期《孝經》的政治、文化作用，觀察到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文化保守派學者多選擇切割「孝」與《孝經》，藉此去除《孝經》原有的政治意涵：他們「重新定義『孝』僅是眾德目之一，或明確將其規限為家庭內的親情倫理，或也批判傳統以孝涵括眾德、移孝作忠的思想」⁷。相對於「孝」的內涵反轉被縮限於「家庭事親」，「忠」的意涵則經歷對象的位移，從君主所象徵之天下轉移至現代民族國家。於是「忠君」之忠成為封建道德之「愚忠」，而忠於現代國家、黨政機器，則又是現代國民應當具備的責任與擔當。在傳統與現代、帝制與民主、個人自由與國家興亡、民族自尊與殖民勢力等思想與歷史的糾葛間，「忠」成為一個包袱沉重，多方思路纏縛，並往往脫不開戰爭血腥的棘手問題。

本文目的不在處理近代中國政治轉型下的忠觀，但其出發點確是有感於轉型前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11, 33-40, 61-65, 151。

³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⁴ 關於晚明公議空間的形成及運作，可參考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第12期（2009年6月），頁41-92。

⁵ Norman Kutcher,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lial Piety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an K. L. Chan and Sor-hoon Tan, eds.,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Thought and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孝文化研究的詳細評述，參見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1-9。

⁶ [明]呂維祺：《孝經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1冊），卷12，頁7a。

⁷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頁298。

後的文化斷裂所導致的隔閡。筆者認為，面對明末清初的種種「忠節現象」，吾人若有意避免意識形態的批判，簡化的揶揄，並真誠面對「現代化」洗禮所造成吾人理解前現代「忠觀」時的隔膜，則勢必需要更進一步檢視明代「忠文化」的內容。筆者注意到《忠經》自宋代至民國初期持續刊刻，明代版本尤多；現今日本所藏江戶末、明治時期出版之《忠經》為數亦可觀。儘管清初四庫館臣從儒家經典的角度判定《忠經》為偽書，評價不高；但從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角度，此書在明、清及後來日本的出版狀況，卻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考慮明清時期《忠經》版本之多，明、清兩代學術思想、社會文化之別，本文在此僅處理明代刊刻之《忠經》。透過考察《忠經》的出版情形及不同刊本中的序跋文字，本文嘗試呈顯明代「忠觀」在不同社會場域中被理解、接受（或拒斥）和使用的狀況。筆者因探索清初文學形塑忠臣之作用，無意間遭遇《忠經》⁸，進而發現，考察此書的出版現象，很可能正是一條有助於現代讀者進入明代忠文化的路徑。作為一卷論說「忠」之要旨之作，《忠經》的內容為抽象義理，但這義理同時被一卷「書」的具體物質媒介所包覆；於接受再製，成為不同版本的過程中，被置入不同的序文、引言、跋文、插圖和編排方式。同樣一套中心思想，隨著出版者、出版意圖、序跋言論、編排呈現的方式不同，其社會意涵亦有所不同。如此，則《忠經》不只是一部篇幅短小的「偽經」，環繞其周邊的出版現象其實更提供了一個文化空間，供我們觀察此一核心儒家思想與社會實況之間的互動。易言之，本文關注重點不在於裁判《忠經》思想內容之優劣，而在於檢視此部經書及其內涵，在明代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如何被解讀、接受與使用。筆者希望透過考察《忠經》出版現象，將思想義理的原型及其在社會場域中的作用活動，加以聯繫，藉此較清楚地把握明代忠文化，以助於貼近理解明、清時人種種關乎「忠」的思考、言行及

⁸ 筆者與《忠經》之遭遇及相關研究的開展，在此要特別感謝中研院近史所呂妙芬研究員。大約是在2011年底，筆者甫開始處理明末清初，時人對於明初建文帝及其忠臣記憶的議題。一次談話中，呂妙芬教授提到在檢視《孝經》的過程，她注意到一部《忠經》但未深入鑽研，建議我不妨留意。2013年初，筆者赴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蒐集「靖難」相關小說、戲曲資料，心血來潮，嘗試將「忠經」二字鍵入電腦檢索系統，發現日本現存江戶、明治時代刊行之《忠經》為數甚多。當中部分為明末清初由中國傳入的版本，多數為日人加以補注、說解、訓讀之新刊。之後筆者復於東京神保町舊書街巧遇一部出版於江戶末期之《繪本忠經》，繪者即為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1760-1849)。眾多機緣，促使筆者嘗試探索本文處理之論題。

書寫。

本文所依據之材料，主要以筆者經眼，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之善本《忠經》為主，輔以其他筆者目前能力所及得以蒐羅之相關版本資料。本文在性質上並非書籍版本資料的整理，而更關心透過書籍內部所提供的出版、思想訊息，我們如何可能更具體地捕捉「忠」概念在明代社會中流動、作用之態勢，因此所求不在齊全匯集所有版本，而更考慮這些版本所能引領我們看到的不同社會文化面向。就這點而言，國家圖書館善本《忠經》的收藏，在數量、書況和類型上，皆可說頗具分量，分別展現了此書與地方府學、藩府、武將、商業出版之間的關係，中、日、北美明代《忠經》館藏，大致不出這幾大面向。本文第二節「《忠經》之體」簡介《忠經》作者、成書年代及內容相關問題。第三、四節，分別就「《忠經》之用：教化、政治與軍事」、「《忠經》作為文化商品：叢書、故事與插畫」析論，每節聚焦於收錄訊息較豐富，具代表性的版本，同時輔以其他相關刊刻資料。為方便讀者，以下列出文中檢視的主要《忠經》版本：

1. 《忠經》明宣德九年 (1434) 蘇州府學刊本
2. 《忠經》明嘉靖三十三年 (1554) 霍氏刊本
3. 《篆孝經一卷，附忠經一卷》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 益藩刊本
4. 《忠經》明隆慶二年 (1568) 襄國（河北）趙孔昭校刊本
5. 《忠經》明萬曆間新安程氏校刊本
6. 《忠經評較》明啓禎間刊本⁹
7. 《忠經詳解》明崇禎間刊本¹⁰
8. 《繪本忠經》日本江戶天保五年 (1834)¹¹

在此必須特別說明的是，上列末項《繪本忠經》為筆者於東京神保町舊書街意外發現之收藏。當中出版頁標示出版年為江戶末期天保五年。頁末題名書中插畫繪者為「葛飾前北齋為一老人」，此即為江戶時期著名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據日本

⁹ 以上六版本收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

¹⁰ 此本現藏於上海圖書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33 冊。

¹¹ 筆者購藏。

學者著錄，北齋晚年作品確實有此作；其於天保四年(1834)，七十四歲時，先完成《繪本孝經》，次年完成《繪本忠經》¹²。雖然時代上此書並不屬明代，但著眼於廣泛流傳於日本江戶、明治時期的《忠經》，絕大多數是明末為士子科考而出版的校注本；且書中以故事解《忠經》的做法，在啓禎年間的《忠經評較》、《忠經詳解》已見端倪；再則《繪本忠經》對於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前現代到近現代的思想傳播和文化轉型，當是值得注意的材料。故而筆者在此將之與明末幾個商業版本聯繫而論，先略做初步介紹，祈能拋磚引玉，促成專家學者進一步探究。

二、《忠經》之體¹³：作者、年代、內容及相關問題

筆者所見《忠經》各本皆題此書為漢代馬融(79-166)撰，鄭玄注。現今學界一致同意此書並非漢代馬融所作；對於此書成書年代有成於唐代及宋代兩種看法，以持唐代成書之論者為多。成書於宋代之說，蓋由於《忠經》在北宋《崇文總目》之前，未見著錄¹⁴。丁晏(1794-1875)《尚書餘論》指出《忠經》內文多處改「民」作「人」，改「治」為「理」，乃唐人避太宗、高宗之諱，推斷此書當作於唐代。余嘉錫(1884-1955)同意此說，但對於《忠經》作者與丁晏持不同意見。丁晏認為唐代亦有一居士馬融。《忠經》之所以題為「馬融」所撰，並非刻意偽託，而是將漢代與唐代之馬融混為一說之故。但余氏指出丁氏此說所依據的《崇文總目輯釋》著錄有誤，不可採用。余氏提出「《宋志》儒家類有馬融《忠經》一卷，小說家類又有海鵬《忠經》一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儒術有《忠經》一卷，注云『海鵬撰，失其姓名』」¹⁵，以此判斷《忠經》作者應為海鵬；既然《通志》注有「海鵬撰」，

¹² 織田一磨：《北齋》（東京：アルス，1926年），頁142。

¹³ 本文段落標題得益於黃俊傑論儒家傳統道德政治觀，原是結合道德（體）、知識（文）、政治（用）為一體，「三者間的關係，是歷代儒者思考問題的一個貫通性主題」。黃俊傑：〈內聖與外王——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黃俊傑主編：《天道與人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頁248。

¹⁴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第22冊，頁188。王玉德：〈論《忠經》的成書年代及與《孝經》之異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4期，頁23-25。

¹⁵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10，頁580。

失其姓名」，則海鵬應為作者之字，而非其名¹⁶。然海鵬所撰之《忠經》在《宋志》中列入小說家類，此《忠經》究為何書，亦未能確言。而無論是唐代馬融或海鵬，史料皆所載甚少。唯一較可確定的是，《忠經》作於唐代之說目前逐步得到較多佐證¹⁷，學者也已有將《忠經》納入唐代經學思想討論範疇者，如齋木哲郎便認為《忠經》裏的忠概念可以從唐中期之後藩鎮割據的局勢來理解¹⁸。

《忠經》體例仿自《孝經》，由十八短章構成。為何作《忠經》？託言馬融所作的〈忠經序〉解釋乃為補《孝經》所言未盡者：

《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以忠應孝，亦著為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誠，信本為政之大體，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¹⁹

此處「《忠經》出於《孝經》」之說，同時指出前者模仿並完備後者的撰作策略和意圖。義理上，《孝經》首章開宗明義便指出行孝的次第及理論範圍：「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²⁰全書屢見從「事親」到「事君」的類比推衍²¹。「孝親」在《孝經》的教說中只是一個起點，其背後扣連著由「家」向外層層推致，忠孝同質的政治秩序觀，此乃《孝經》之教的核心，亦即「孝治天下」的理論基礎²²。

¹⁶ 同前註，頁 579-581。

¹⁷ 如舒大剛引陳子昂〈堂弟孜墓誌銘并序〉中所記載其族弟陳孜陪葬品之記述：「是用錫爾瓦木之器……堯、舜之〈典〉，忠、孝之〈經〉，昭示後代，以安爾形。」證明唐高宗或武周時期已有一部《忠經》。舒大剛：〈擬聖仿經：唐代的《孝經》仿作〉，《至德要道：儒家孝悌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 244。

¹⁸ 齋木哲郎：〈唐代新春秋学の展開と「忠」思想〉，《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第 23 卷（2008 年），頁 273-283。

¹⁹ 〔漢〕馬融：〈忠經序〉，《忠經》，收入毛晉輯：《津逮秘書》（上海：博古齋，1922 年），第 4 集，頁 2337。

²⁰ 〔唐〕唐玄宗注，〔宋〕邢昺疏：〈開宗明義章〉，《孝經注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年《四部備要·經部》第 41 冊），卷 1，頁 1a。

²¹ 如：「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同前註，卷 7，頁 1b。

²² 此處僅就與《忠經》可參照處簡要論及《孝經》，關於《孝經》定位的歷史變化及其政教意涵詳盡的論述，參見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第二、三章。

故〈忠經序〉作者言《忠經》之教出於《孝經》，形制上亦模仿後者作十八章。第一章為全書總綱；二至六章沿襲《孝經》自天子、諸侯至庶人分論五等孝，《忠經》則自聖君、冢臣至兆人分言五等忠；之後《忠經》中的〈保孝行章〉、〈廣為國章〉、〈廣至理章〉、〈揚聖章〉、〈忠諫章〉、〈證應章〉皆可見與《孝經》〈紀孝行章〉、〈廣要道章〉、〈廣至德章〉、〈廣揚名章〉、〈諫諍章〉、〈感應章〉相互呼應之意²³。

值得注意的是：《忠經》出於《孝經》的派生關係，在明代同時可見被援引用以支持或批評《忠經》的刊刻。絕大多數明代作者看待《忠經》，皆如〈忠經序〉視此經為《孝經》之延伸，支持其刊刻，這點下節細論。較少數批評者則有如晚明纂輯《孝經總類》的朱鴻（約生於 1510 年）所言：

《經》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言忠、孝一道也。」以是知馬融作《忠經》為僭擬，鄭玄註解為支離。……今觀融之《忠經》……意謂眾善咸起於忠，故〈保孝行章〉曰：「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若然，則隱居之士終不得以孝其親乎？……融推忠之義甚大，故並立二經以補夫子之缺。不知人臣之義，莫備於《春秋》。……《春秋》即夫子之《忠經》也。」²⁴

這裏朱鴻貶黜《忠經》的理由有二，一是此書「推忠之義甚大」，言「君子行孝必先以忠」，倒轉了《孝經》由孝而忠的次第²⁵。二是朱鴻持論《忠經》所授之義理，與《孝經》之教乃「一道」，另作文章反成「支離」。朱鴻取用漢代緯書之說，認為「《孝經》立萬世人子之則，《春秋》嚴萬世人臣之防……《春秋》即夫子之《忠經》」²⁶。呂維祺則更直接認為《孝經》第十七章「于忠君一節尤為篤摯。是經也，謂之《孝經》可，即謂之《忠經》亦可」²⁷。如此，忠孝之道具足於《孝經》之中，毋

²³ 《忠經》、《孝經》篇目對照表，參見附錄一。據〈忠經序〉「以忠應孝，亦著為十有八章」之言，可知作者所指《孝經》乃分為十八章的今文《孝經》，而非二十二章的古文《孝經》。關於今古文《孝經》之別，參見〔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2，「《古文孝經指解》」條。

²⁴ 〔明〕朱鴻：〈讀忠經辨〉，《孝經總類·已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冊），頁62a-b。

²⁵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頁113-114。

²⁶ 朱鴻：〈讀忠經辨〉，頁62b。

²⁷ 呂維祺：《孝經大全》，卷12，頁7a-b。

需外求。呂氏復進一步批評《忠經》「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裂，全不類經」²⁸。朱鴻與呂維祺皆屬於呂妙芬所論，晚明年間致力提倡《孝經》的士人，兩人對於《忠經》乃湊泊、多餘之作的觀點，必須在其重振孝經學的意圖之下理解。在此之前，筆者目前僅見周琦（成化十七年進士）對《忠經》持類似看法²⁹。有趣的是，朱、呂等學者重振孝經學時所面對的，是宋代以來《孝經》「僅被視為一部淺近、俚白、義理不精、文字雜綴卻又託言聖賢的書籍」³⁰之窘況，而其對《忠經》義理支離、文字湊泊割裂、非皆孔子之言的批評，似乎某種程度上複製了《孝經》所遭受的非難。

周琦、朱鴻與呂維祺的批評從反面證明了《忠經》在其時已為士人學者所習讀，故而其於致力推舉《孝經》的同時，必須切割《孝經》與地位次一等的《忠經》³¹。相對於三人從義理、文字、非皆孔子言三方面貶抑《忠經》，多數明代讀者顧慮的問題倒不在此，而在於此經所宣稱之作者馬融人格上的爭議。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記錄明初能臣況鍾（1383-1442）於蘇州刊刻《忠經》時，府學中一位蔣司訓的反應，或許最能傳神呈現《忠經》在明初士子認知中的疵病：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日，郡守況侯鍾行部，

²⁸ 同前註。

²⁹ 周琦，字廷璽，馬平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員外郎。琦之學出於薛瑄（1389-1464），著《東溪日談錄》十八卷，一本濂洛之說，不失醇正，蓋河東之學。雖或失之拘謹，而篤實近理。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3冊，卷93，頁13b-14a。《東溪日談錄》「著述談」中，周琦於談論《朱子定本孝經》時附帶而言：「孝是人之出門第一件事。《孝經》當與《忠經》相對，但《忠經》無立言至理，且非聖賢之言，故不足伍耳。」〔明〕周琦：《東溪日談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4冊），卷12，頁2b。

³⁰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頁110。

³¹ 筆者蒐尋方志庫時注意到《忠經》用例到晚明尤多。除本文第三節所討論者，茲可舉例如黃士俊（1579-1655，萬曆35年進士，字亮坦，福建莆田人）〈五倫翼序〉提到學憲何公「取《孝經》、《忠經》、《小學》及諸書中撮其切且要者，分列目次為《五倫翼》」。見〔清〕曾毓璋《（同治）廣昌縣志》（清同治六年刻本），卷9，頁59b。翟鳳翥（？-約1660，字象陸，順治年間進士）撰〈曹月川先生傳〉言曹氏「讀《忠經》曰：『不如是，不成人臣。』」見〔清〕章廷珪《（雍正）平陽府志》（清乾隆元年刻本），卷14，頁17b。蕭嗣立（萬曆年間舉人，番禺人）〈王氏家訓序〉提到「邇來扶教者請立《孝經》、《忠經》於鬻序以課士」，見〔清〕周天爵：《（道光）阜陽縣志》（清道光九年刊本），卷20，頁12b。《宣城縣志》記載梅士生（1642-？，入監授文華殿中書）「破產購書，所刻有《忠經》、《郁離子》、《孫武子註》等書」，見〔清〕李應泰：《（光緒）宣城縣志》（清光緒十四年刊本），卷16，頁9a。

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眾為之驚慄。侯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本，改則未敢耳。」³²

馬融才高博洽，為東漢大儒。然其為人「不拘儒者之節」，講學時設帳於堂上，帳前教授學生，帳後請歌妓奏樂。再者，馬融曾因上書諷諫而得罪當權外戚，遭免官禁錮。之後為免再次得罪當道，屈身妥協為外戚出身之權臣梁冀(?-159)草擬奏章，陷害與梁冀相抗之正臣李固(94-147)，又為梁冀作〈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³³。蔣司訓的反應與時代稍早的方孝孺(1357-1402)可相呼應。方氏論：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為高哉？……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為患失者之戒乎？³⁴

沈津³⁵所輯，隆慶元年(1567)含山縣儒學刻本《百家類纂》收錄《忠經》，當中〈忠經題辭〉亦可見幾乎全引方孝孺此段評論。這篇題辭為《忠經》辯護的策略乃作者「其人則非，其言則有可取」³⁶；且馬融最後聲名、利祿兩無所得的下場，正可令後學引以為戒。

上文所列論幾點《忠經》疵病之外，絕大多數的明代官吏士子仍持「不以人廢言」的立場，樂於協助、支持《忠經》的刊刻。儘管有論者認為《忠經》內容不出《孝經》之教，然而下文當我們綜覽分析明代不同時期之《忠經》序跋文字時，將可見多數作者認可、甚至認為有必要在《孝經》的基礎上延伸作《忠經》，以便能聚焦於「忠」之意涵、君臣職分、政理治道，做進一步的分疏提要。於是《忠經》的疵病一方面解釋了此書與《孝經》高下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帶出了其他值得關注的問題：既然《忠經》就醇正之學的角度觀之，有所欠缺，何以終有明一代刊

³² 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3，頁31，「蔣司訓」條。

³³ [東漢]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7冊，卷60，頁31。

³⁴ [明]方孝孺：〈馬融〉，《遜志齋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00年），卷5，頁144-145。

³⁵ 沈津，生卒年不詳。據《四庫全書總目》，沈津，慈溪人，嘉靖中官含山縣（今安徽省含山縣）教諭。

³⁶ 作者不詳：〈忠經題辭〉，[明]沈津輯：《百家類纂》（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7冊），卷9，頁1a。

行不輟？時人基於哪些原因需要這樣一部《忠經》？

進入下文考察明人如何解讀、運用、行銷《忠經》之前，在此有必要先略論《忠經》內容，因為經文意涵與後來讀者的解讀詮釋、書本的社會作用，相互關聯。筆者著重觀察指出《忠經》可能特別有助於為政的內容，畢竟在晚明大量商業出版之前，《忠經》的刊刻者主要是士人學者。如果我們意圖超越前現代「忠」文化乃君主專制幫兇的觀點，便必須先理解，《忠經》為君臣關係提供了什麼樣的理論基礎，此經又為何被士人學者認可為「可用」之具？

《忠經》以第一章〈天地神明〉作為全書總綱，之後第二到第六章如前文所言，仿《孝經》依次闡明聖君、冢臣、百工、守宰、兆人「五等忠」。第一到第六章試圖聯繫天、人，其中人的部分又依身分階區別不同職司者之忠的內容。從天到君、臣、百姓，此段經文試圖確立「忠德」乃連貫天地人世、上下階層，促成家國社會一體運行的重要德目。其做法是將天地之自然性質貫通至個人行事與家國之治。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為國之本，何莫由忠。³⁷

上引〈天地神明〉，開篇「上下一德」便先點明忠德的貫通性。接著序列天、地、人無私之句，將天地化育，大公無私，澤被萬物的自然運行，作為人立身處事效法的對象；如是，人同天地，其「忠德」皆以大公無私為基本意涵。最後，「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之「一」，則透過經文前後文脈以及相關之思想史研究，或可歸納出至少兩點要義：一是「上下一德」，聯繫天、地、人的「貫通」之意；二是無所偏私，處事以「中」的「大公」之意。學者對於宋明理學中的公私之辨已有精要的綜論，但未及於「忠」³⁸。「忠」與「公」意涵上的互涉關係乃一大議題，非本文所能處理；但有必要指出，《忠經》言「大公無私」並非全然泯除個人之意。事實上，從早期文本中「忠」概念的使用，我們可以看出「捨私為公」之論，其實是從

³⁷ [明]陶原良詳解：〈天地神明〉，《忠經詳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33冊，頁479（原書頁碼難以辨識）。由於《忠經》各本並無重大異文，為方便讀者檢索，下文所引《忠經》若無特別標明，皆引自此本。

³⁸ 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1-57。

一種推己及人的「共感」過程推衍而來。佐藤將之所舉《國語》中所載宮之奇的言論，是個清楚的例子。晉獻公為吞滅虢和虞，先贈名馬和名玉予虞主，以借虞國之道伐虢，而回程時一併吞滅了虞國。宮之奇評論認為：虞國滅亡乃「非忠」及「非信」的結果。「非忠」，因為虞主借道助晉滅虢，「施其所惡於人」；「非信」，因為虞主「以賄滅親」（虞、虢兩國同為姬姓）³⁹。據宮之奇所言，不「施其所惡於人」可謂忠；此與《論語》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內涵意思接近⁴⁰。換言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外推待人處事，為己、為人的心思行為便無二致，此是為無私。此一行為準則從個人、家庭乃至社稷天下層層外推，便是大公無私。此亦《忠經》「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之謂⁴¹。

總論「忠」的基本意涵之後，《忠經》承前章已樹立之天人關係，講述人君盡忠的內容：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⁴²

此處言人君自身必須內涵「聖德」。如同其臣民各有所司「各有尊」，君主亦須行其職分「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其具體做法當「祿賢官能」；求致的目標為使「黎民咸懷」，「以保社稷，以光祖考」⁴³。據佐藤將之考察，「春秋時代的『忠』字中『君德』的意涵也相當濃厚」⁴⁴，在《左傳》、《國語》、中山王陵銘文中，「忠」的對象往往並非只針對君王，而是整個社稷⁴⁵。《忠經》裏我們可見保留了對保固社稷、惠澤黎民之君德的要求。

³⁹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頁 50-51。

⁴⁰ 馬淵昌也〈明代中晚期儒學思想中「恕」概念之定位初探〉一文雖主論「恕」，但偶涉及「忠恕」之處，對筆者時有啟發。收入林維杰、黃雅嫻主編：《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論與內在超越性》（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4年），頁 121-159。

⁴¹ 《忠經》，頁 479。

⁴² 同前註。

⁴³ 同前註。

⁴⁴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頁 42。

⁴⁵ 同前註，頁 55、57、63。趙園對於明清之際忠臣抉擇的觀察，亦可與此呼應：「還應當說，當時忠臣義士的動機、動力，未必盡在保全或恢復『朱家一塊土』。梁份以魯仲連自許——是魯仲連，而非『報韓』的張良，強調的是排難解紛，所持也更『民生』立場。」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 93-94。

但保固社稷、惠澤黎民的目標，並非君主個人所能達成，必須透過冢臣及各部吏員謀劃，地方守宰施行辦理，這也是為什麼《忠經》界定君主的功能在「監於萬邦」，僅屬「監看」之職；而在第二章論冢臣職分時明言「冢臣於君，可謂一體」⁴⁶。《忠經》強調「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⁴⁷，以沉著謀劃、裨益社稷為大臣盡忠之要，死諫殉國都屬其次；第四章〈百工〉亦教示各部官員當「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⁴⁸；兩處說法皆是將國、民之安定福祉置於個人和君主之上。依此，就正國安人的施政目標而言，在《忠經》所勾勒的理想藍圖中，君臣之間乃合作關係，故「冢臣於君，可謂一體」。我們也當注意到，經文教示冢臣主政原則，須「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以委任賢吏分工治理為重，餘則正己從禮，政事自可運行，這點近似聖君之職；所不同在於就上下階序而言，君主必須敬天地，冢臣則須「尊其君」。

從天人和社會階序關係分別界定「忠」的範疇之後，《忠經》第七章〈政理〉、第八章〈武備〉分就道德與刑罰、武力的關係談論施政原則。要言之，《忠經》提出「化之以德理之上」、「施之以政理之中」、「懲之以刑理之下」⁴⁹的施政階序，仍以「德化」為政理之最上乘，但認可「刑懲」為施政手段之一；同時並試圖藉助道德教化的力量抑制嚴刑之害，告誡：「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⁵⁰同樣地，在對外關係上，〈武備〉一章提出的仍是自仁義、信賞一路下行至武力威刑的處理順序；武可備而不用，然不可不備，此王者所以「威四方，安萬人也」⁵¹。

第九到十七章則可視為對君臣盡忠之職分較具體的分項敘述，當中隱然在君職、臣職之間構成一種往復應和的節奏。第九章〈觀風〉言「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⁵²，人臣作為天子耳目，必須明視審聽以辨別善惡，公允斷事。第十章〈保孝行〉中「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一句，扼要闡明了忠孝之間的延

⁴⁶ 《忠經》，頁 480。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同前註，頁 481。「中」字據其他刊本校改。

⁵⁰ 同前註。「殘」字據其他刊本校改。

⁵¹ 同前註。

⁵² 同前註，頁 482。

伸關係；兩者皆始自於「愛敬之心」，以此心養其親為孝，延伸向外施及於人則為忠。此二章分就人臣處於「外」（四方、社稷）與「內」（雙親、家室）的位置闡明「忠職」的內涵之後，接下來兩章轉向對「君職」的要求。第十一章〈廣為國〉指出「任正（忠）去邪（不忠）」⁵³乃明主治國之關鍵。欲達至「內睦以文，外威以武」，「大化興行，蠻夷率服」的理想景況，必定是「下忠上信之所致」⁵⁴，如此再次強調了明主與忠臣互信相濟的關係。第十二章〈廣至理〉以「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起首，與之前〈觀風〉一章言人臣出於四方觀風當「聽聰視明」，可謂相互呼應。〈觀風〉章告誡人臣理政於四方當「去其私」，〈廣至理〉章勸諭人君「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⁵⁵；君臣位置固然不同，但其忠行背後其實精神貫通，做法亦有可類比之處。

經文行進的韻律再度將行動主體帶回人臣身上。第十三章〈揚聖〉表面上鼓吹人臣頌揚聖德，但在陳說「君德聖明，忠臣以榮」的同時，提出了「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之論，其實是承認了「君德不足」的可能實際情況，嘗試補強前述「下忠上信」理想理論的漏洞。此章補救「君德不足」的責任落在忠臣身上，下一章〈辨忠〉復轉強調「明王為國，必先辨忠」⁵⁶之責。第十五章〈忠諫〉可說是針對「君德不足」的狀況延續思考，提出「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⁵⁷的次第。在君臣職分的分配中，「死諫」無疑是人臣最沉重而艱難的承負，以至於第十六章〈證應〉必須納入天道賞善刑惡的觀點，宣揚「善莫大於作忠……忠則福祿至焉」的信念，確立「忠行」的終極意義。此章經文首句「惟天監人」，亦可說是透過高於君主，裁判善惡之天的力量，同時規範君、臣，未必專就人臣而言。接續此章從道德感應立說，第十七章〈報國〉轉從四個面向具體提出人臣報國之方：貢賢、獻猷、立功、興利。第十八章〈盡忠〉總結。

《忠經》各章內容在君臣、天人、理事之間交錯相應，其論說帶有一種往復遞進的動態。蕭公權從「現代」觀點評論：「《忠經》雖亦徧論君臣之忠，然其最後

⁵³ 原文為：「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

⁵⁴ 同前註，頁 483。

⁵⁵ 同前註。

⁵⁶ 同前註，頁 484。

⁵⁷ 同前註。

之歸宿為尊君，其中心之樞紐為君德。」⁵⁸ 此書「所舉實行忠道之治術，大抵不出修身化德之傳統理想」⁵⁹，確實如此。但若我們嘗試貼近帝制時期士人的政治選項，《忠經》各有所取「折衷式」的論述策略，或許正是明人眼中此書的「可用」之處。相對於先秦「忠觀」，它提升了君主的位置（以「聖」君名之同時也就是要求君「德」），但同時注意平衡對於君、臣職分的要求。它強調「尊君」，但將「尊君」背後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天人一貫，以及「大公」之天與「不私」之聖君的類比疊合上⁶⁰。細審其文字，我們發現《忠經》賦予聖君的職責，不出「事於天、地、宗廟」，「任正去邪」，「自然無為、不疑不私」⁶¹；它一方面高揚君主地位，另一方面卻賦予聖君極少施政上的實權。當然，這只是樂觀的理想藍圖，實際執行上衍生的種種問題必須另當別論。但我們考察明人對《忠經》的接受與解讀之前，卻不能不注意到此經所包容的詮釋彈性。此外，姑且不論其思想內容之高下，從下文明代談論《忠經》的文字可見，大多數的時候讀者所重並不在評價其義理，而是在接受此一倫理條目的前提下，透過《忠經》陳說、議論治道，如此環繞著《忠經》形成了一個談忠言政的論域。

三、《忠經》之用：教化、政治與軍事

筆者目前所見最早的明代《忠經》版本，為宣德九年蘇州府學刊本。此刊本有〈宣德甲寅會稽韓陽序〉，以及題名〈宣德九年會稽胡季舟謹識〉⁶²之跋文。據韓陽

⁵⁸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189。對《忠經》思想的討論，尚可參考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頁 270-285。

⁵⁹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189。

⁶⁰ 關於中國「天之公」的觀念及意涵，溝口雄三在〈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一文中多有洞見觀察。其中他指出：「中國的天之無私不偏性，即天之公中的公平、公正，不僅是道義的，而且還具有原理的普遍性。……在中國，從天下的角度來看，皇帝、朝廷或國家均被視為一姓一家之私，這一點與日本視國家、天皇為『おほやけ』（公）的最高層次是非常不同的。這裏，天之公變為天下之公，公平、公正當作普遍的原理，皇帝、朝廷、國家亦受其制約。……公具有適用於天下的原理性，可制約『一姓之私』。」溝口雄三：〈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二十一世紀》第 21 期（1994 年 2 月），頁 87-88。

⁶¹ 見《忠經》第二、十一、十二、十四章。

⁶² 胡季舟，浙江會稽人。舉人，正統間任教授。〔明〕陳洪謨：《（嘉靖）常德府志》，卷 12，頁 23a。

序文所言《忠經》之流傳：「惜乎述作之後，世遠言湮，子弟習讀，但知《孝經》之所以為孝，而不知《忠經》之所以為忠，深有味乎前賢作經之旨。」胡季舟〈書忠經卷後〉言：「惜乎《孝經》獨行於世，而此書罕見焉。」⁶³當時《忠經》之流傳似乎有限⁶⁴。筆者所見幾個明代中期刊刻之《忠經》，多附上此篇韓陽〈忠經序〉說明《忠經》問世經過⁶⁵，當中序跋作者亦同意《忠經》「今歷千餘歲，傳者寡焉」⁶⁶，可見應不只是韓陽自我吹捧之言。

此刊本問世經過，韓陽序文如是說明：

陽自早歲先君子授是經……今既厠職蘇庠，遇春官況侯……明其居官守職為國為民之政，莫非忠孝先之焉，而為詩曰：「報國一心何日盡，思親雙淚幾時乾？」惓惓盡己之誠，與此經若合符然。由是繕寫一本，奉為覽觀。侯忻然以謂有功名教之書，鈔梓廣示來學。⁶⁷

引文中言韓陽自幼由其父傳授《忠經》，任職於蘇庠時，遇蘇州府知府況鍾。況鍾為人剛正，為官廉能，《明史》記載其於宣德五年擢知蘇州，時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然治理數年之後，況鍾「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⁶⁸。馮夢龍《警世通言》〈況太守斷死孩兒〉故事，況太守即是況鍾。清初蘇州派劇作家朱素臣所作傳奇《雙熊夢》（又名《十五貫》）當中為冤獄平反者也是況鍾。據韓陽序，為黎民謀福戮力從公的況鍾，在一首詩中述其一心報國，同時不免思親，忠孝糾葛的感傷。韓陽聞此，於是繕寫《忠經》一本致予況鍾，況鍾以其有助於名教而將此書付梓。

韓陽的角色，除了促成明初《忠經》刊本問世，由於筆者對《忠經》的關注始自「靖難」，亦注意到此本的刊刻時間，距離「靖難」時代非遠。韓陽：

字伯陽，山陰人，永樂丁酉以《春秋》魁兩浙，歷蘇、松二郡，司訓教士，

⁶³ [明] 胡季舟：〈書忠經卷後〉，《忠經》（明宣德九年蘇州府學刊本）。

⁶⁴ [明] 韓陽：〈忠經序〉，同前註。

⁶⁵ 筆者所見有明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明隆慶二年襄國趙孔昭校刊本。

⁶⁶ [明] 玉泉山人：〈刻忠經後言〉，《忠經》（明隆慶二年襄國趙孔昭校刊本）。

⁶⁷ 韓陽：〈忠經序〉，《忠經》（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亦可見於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33冊，頁476，但文字略有出入。

⁶⁸ [明]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卷161，頁4380。

有成業，譽望日起。典江右試事，所錄者皆名士，後多至名公卿。轉丹陽教諭，用太常卿姚友直薦，擢南監察御史，論奏不避權要。楊文定公溥，時為宗伯，推陽學行可師表一方……。⁶⁹

韓陽永樂十五年中舉，距「靖難」結束十五年。授之以《忠經》的韓陽之父，當是經歷這場政治風暴之人。韓陽籍居山陰（今浙江紹興），與出身寧海（今浙江寧波）的方孝孺，皆地屬浙東。推譽韓陽，明初重臣「三楊」之一的楊溥（1372-1446），於建文二年進士及第。蛛絲馬跡，先略記於此；《忠經》於明初蘇州之刊刻，背後或許有現存版本材料未能考掘出的故事與社會氛圍。此外，另一位「三楊」楊士奇（1365-1444），其書目筆記錄有「《忠經》一冊……蜀中有刻板」⁷⁰。可知明初蘇州之外，蜀地亦存《忠經》刻板。

進入明中葉，汪舜民（?-1508）⁷¹弘治甲子年（1504）於「彭城兵備行臺之東壁」撰〈忠說〉，文中藉《忠經》論忠，為此時期《忠經》傳播使用一例⁷²。另外，士人學者張邦奇（1484-1544）〈忠經序〉⁷³提到其文乃為岷王梓刻之《忠經》而作⁷⁴。岷王

⁶⁹ [清]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卷162，頁42415。

⁷⁰ [明] 楊士奇：《東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冊），續集卷17，頁7b。

⁷¹ 汪舜民，字從仁，婺源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官將帥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從父奎以御史言事廷杖，舜民扶掖之，坐謫雲南蒙自衛經歷。弘治時，適淮、揚大饑，以故官奉命振濟。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宥復業者八千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正德二年六月丙戌卒。舜民有才略，平生亦矯矯以風節自勵者。見〈南京右副都御史汪舜民傳〉，收入[明]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64，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年），第112冊，頁59a-b。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180，頁4781-4783。

⁷² 另一條材料是稍早於汪舜民的楊守陳（1425-1489），在其所撰〈策題〉中提及馬融《忠經》。[明] 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7冊，卷26，頁9a。

⁷³ 張邦奇，字常甫，別號兀涯，門人稱甬川先生，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年間曾任湖廣按察司副使，嘉靖間歷吏部右侍郎，推轂善類，人不可干以私。官至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嘉靖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諡文定。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23-524。

⁷⁴ 筆者檢索「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以及臺灣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後者彙整大陸、日本、美國、歐洲等地區古籍收藏量居前的圖書館資料庫，但當中未見岷王刻本。疑此本今不傳。

朱榘(1379-1450)因與沐晟不睦，岷王府封地於洪熙元年自雲南移至湖廣武岡州⁷⁵，據此知明中期湖廣地區已見《忠經》傳本。不同於蘇州府學本中序跋文字，主要交代《忠經》刊行緣由，「學以程、朱為宗」⁷⁶的張邦奇逕自義理入手，提出以「民」為核心的《忠經》闡釋。其文起首言：「天之立君以為民也，降生英賢以事君也。勞以承君，德以孚民，以成身也，其身克成以事親也。」⁷⁷從「為民」出發，一層層聯繫起君臣之職及忠孝之道。相對於《忠經》由天而君臣而民，自上而下依位階等差論忠；張邦奇轉以「民」作為天所以立君之理據，非為民則無須立君，而降生英賢事君，目的亦在為民。人臣於是在君、民之間居於樞紐位置，一方面勞身勞心以承輔君職，另一方面以其茂德取信於人民。人臣上下承負，勞頓修德，同時又是修身磨練的過程，成事惠民，便是揚親之孝。張邦奇並以「仁」、「忠」類比：「生物之心，充周無間，故謂之仁；奉天之心，整竭無餘，故謂之忠。」⁷⁸這裏張氏不言尊君，直接詮解「忠」為「奉天之心」，乃人臣君子師法天生萬物之仁心，行之於人世的意念及做為。如此，張氏詮釋下的「忠」德，所強調不在天→君→臣→民的階序，而是將人臣置於其思考中心，提出連貫天、親、君、民的忠德理論：「君子之在官也……視民猶視君也，視君猶視親也，視親猶視天也。」⁷⁹四者疊合相通如一體。透過以民為本，忠即行仁的概念，張邦奇的詮解避開了《忠經》「尊君」說可能造成的尊卑之隔，並消解了忠與孝、修身與為政之間可能的衝突，此乃其長。但在接下來將討論的益藩刊本中，我們將看到，理論上的自足之外，實際君臣關係中可能遭遇的問題。

嘉靖三十四年益藩刊本《篆忠經》，與《篆孝經》合刊。《篆忠經》以古篆體刻寫經書全文，正文前皆僅附〈篆忠經序〉一篇，目前可見兩部刻本，一部為「明嘉靖乙卯益藩刊本」，序末題「大明高皇帝八代孫益藩宗室慎庵識」，全文共四九九字，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⁸⁰；另一部為「明嘉靖乙卯益藩舒城王府刊本」，

⁷⁵ 楊士奇等：《明仁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9下，頁6b，「洪熙元年四月己酉」條。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118，頁3602。

⁷⁶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210，頁5317。

⁷⁷ [明]張邦奇：〈忠經序〉，《張文定公紆玉樓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36冊），卷1，頁8a。

⁷⁸ 同前註。

⁷⁹ 同前註。

⁸⁰ 參見附錄二。

序末題「大明高皇帝八世孫益藩舒城王永仁道人製」，全文五九三字，筆者所見為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益藩（封地在今江西南城一帶）莊王朱厚燁（1498-1556），號勿齋，明憲宗庶六子朱祐檣嫡子。朱厚燁於嘉靖二十年襲封益王，三十五年薨。據《國朝獻徵錄》，朱厚燁「考覽六經，蒐綜百氏，神妙解悟……自以勿名齋，日嚴飭治之功，本原澄澈，踐履光明……精研書法，真草小篆，為世所珍」⁸¹。兩篇〈篆忠經序〉作者朱慎庵與朱永仁於明代文獻中記載甚少，僅知嘉靖三十八年朱厚燁之弟，朱厚炫三子載垓封舒城王⁸²，餘待進一步詳考。

《篆忠經》兩部版本正文內容、字體、版式皆同；兩篇序文皆為一行十二字，一頁八行，字體相近。有趣的是，其內容異同各半，讀來彷彿對《忠經》「二重奏」式的詮解。序文前半，除了表述文字時有參差，內容同為在《孝經》之外另刊《忠經》之解釋：

《孝經》作於周末，孔、曾授受之懿，傳之後世而無弊。然一孝立而萬善從，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隨其所直，舉而措之，若無俟於他求也。復有《忠經》之著焉，何哉？所以勵中人性也。夫上智之生也不數，中材之在天下也寔多，上智一慮而百通，中材因觸而後悟。是故《孝經》雖燦然大明矣，而《忠經》不容於不作也。……夫帝尊而弗親，然親親而弗尊。惟其尊而弗親，孝以親之；惟其親而弗尊，忠以尊之。以事親之心事乎帝，孝即忠也。⁸³

引文指出，義理上《孝經》移孝於忠之說固已完備，但就讀者而言，其教卻非人人可領會並正確實踐，當中有「上智」與「中材」之別，因此需要《忠經》進一步闡明行孝與盡忠之間的恰切關係。然雖說是闡釋，有別於《孝經》強調孝道與忠道之間自然推衍，順理而致的關係，〈篆忠經序〉其實點出了兩者間「親」、「尊」情感上之別——「帝尊而弗親，親親而弗尊」，亦即忠孝轉化理論中未必自然順情之處。只是序文作者的書寫意圖不在於強調此差別，而在化解此差別，故而採取

⁸¹ [明]張時徹：〈益莊王神道碑銘〉，焦竑：《國朝獻徵錄》，卷2，頁59a-b。關於包括益藩的明代王府刻書，參見Jerome Kerlouegan, "Printing and Publications by Ming Princes,"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1 (2011): 39-73。

⁸² [明]張居正等：《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477，頁3a，「嘉靖三十八年十月王子」條。

⁸³ [明]朱慎庵：〈篆忠經序〉，《篆孝經卷，附忠經一卷》（明嘉靖乙卯益藩刊本）。

平衡調和之策，教授讀者對處於尊位之君當「孝以親之」，對於雙親則當「忠以尊之」。之後以「忠者，盡己之心之謂也」的基本定義，重申「忠」德如何可推致五倫，有利家邦。

相較於朱慎庵〈篆忠經序〉試圖透過陳述「忠」德在五倫社會關係中的普遍作用，以說明刊刻《忠經》的必要，朱永仁的序文在「帝尊而弗親，親親而弗尊」一段之後，將焦點轉至人臣如何可能化解「帝尊而弗親」的問題：

宋和靖尹氏曰：「人君其尊如天，不可不敬。」然天雖遠也，有道以格之，誠而已矣；君雖尊也，有機以感之，亦誠而已矣。蓋誠也者，天之理也，人之心也。人臣之事其君也，不惟其貌，惟其誠；不惟其分，惟其德。是故責難非所以為恭，而致恭於未言之先；陳善非所以為敬，而致敬於未陳之先；有所告詔，非所以為忠，而盡慎竭誠於未告未詔之先……吾之心既足以感動乎君心，而君之心亦將以其誠與吾而相應。未言而志已孚，既言而誠愈篤。不惟豫吾之言，而且鑒吾之心；不惟諒吾之志，而且行吾之道……使徒勢分為尊，奔走以為敬，具臣焉耳，烏足以語大忠之誼哉？⁸⁴

此段論述先提出「尊君如天」導致君臣距離產生的問題。次提出以「誠」感君作為跨越君臣之隔的方法，強調「責難」、「陳善」、「告詔」雖為人臣事君之職分（外在做為），但必須以「恭」、「敬」、「盡慎竭誠」之「德」為內在基礎。最後從效果陳說以「誠」為出發點事君，將可感動君心，使君心亦「以其誠與吾而相應……鑒吾之心……行吾之道」。相對於《忠經》列示一幅君臣分工的藍圖，張邦奇序推重於「民」，朱永仁序特針對「人君其尊如天」提出因應之道，暗示「尊君」主張在實行上造成君臣疏遠的問題。於是他補充「忠」的內涵，指出人臣若只是一味尊君於上，自己奔走於下，任憑君臣隔膜，不可謂「大忠」。而所謂「大忠」，意謂人臣必須透過恭敬、篤誠之心以感動，進而影響君主，使後者依前者之志道而行。在君臣職能分工合作的關係之外，朱永仁增加了對人臣透過道德感發作用觸動君主的期待，也透露出他眼中所見「事君」的難處。

君臣之隔並非朱永仁獨見的問題。早於益藩刊本僅一年的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當中徐霈所撰〈忠經序〉亦提到類似的問題：「今夫忠孝一道也……但孝之事易見，而忠之理難明。何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分殊也。惟邇則切，切則

⁸⁴ [明]朱永仁：〈篆忠經序〉，《篆忠經》（明嘉靖乙卯益藩舒城王府刊本）。

感；惟遠則離，離則忘。……孝則中人可勉，忠則上智猶或懼焉。」⁸⁵ 徐霈並未如朱永仁詳言「感」君之道，推促人臣積極親近君心，而是從思慮「忠德」失落的角
度，透過《忠經》提醒為臣者「忠」之本義，莫因實際施政場域內有形無形的距離
而忘君。以朱永仁與徐霈之言互參，我們看到「尊君如天」所衍生問題的兩面：一
是君臣間的尊卑距離凌駕原應存在的合作關係，臣道益難；但同時距離也可能使君
主成為受其臣下遺忘、隔離的一方，使君孤無臣助。唐錦(1475-1554)⁸⁶〈忠經引〉
言「臣之於君，猶翼而飛，趾而馳」⁸⁷，則無臣襄助之君，宛然如折翼無趾之困龍。

益藩刊本《篆忠經》附於《篆孝經》後合刊，霍氏刊本亦為合刊，刊者霍冀
(1516-1575)取此書「附於《孝經》，并《古小學》合為三編」⁸⁸。此明刊本為目前筆
者所見，序跋文字最豐富者。其序文編排及作者題名依序為：

〈忠經引〉十二連城子

〈忠經序〉宣德甲寅冬十月初吉會稽韓陽序

〈重刻忠經序〉嘉靖甲寅秋季後學黃洪毗撰⁸⁹

〈忠經序〉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前吏科左給事
中浙江東徐霈書⁹⁰

⁸⁵ [明] 徐霈：〈忠經序〉，《忠經》（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

⁸⁶ 唐錦〈忠經引〉所出之版本，筆者於各古籍書目數據庫中未見。唐錦，字士綱，號龍江居士，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除東明知縣，陞兵科給事中。宸濠叛，錦集城中士民，激以大義，捕內官杜茂等四十二人，馳請王守仁入城，建首功，尋落職致仕，年八十卒。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00。佚名：〈江西提學副使唐公行狀〉，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86，頁 76a-78b。[明] 朱希周：〈明故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唐公墓誌銘〉，《龍江集·附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334 冊），卷 14，頁 1a-5a。

⁸⁷ [明] 唐錦：〈忠經引〉，《龍江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34 冊），卷 14，頁 4a。

⁸⁸ 徐霈：〈忠經序〉，《忠經》（明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

⁸⁹ 黃洪毗，福建莆田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二十七年(1548)任巡撫遼東兼理軍務御史，二十八年(1549)提調南直隸學校，三十三年任山東參議，三十四年二月到任。見《明世宗實錄》，卷 334，頁 1a，「嘉靖二十七年三月丁丑朔」條；卷 355，頁 2a，「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朔」條、頁 3a，「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乙亥朔」條；及 [明] 林庭楫：《（嘉靖）江西通志》，卷 2，頁 74b。

⁹⁰ 徐霈，字孔霖，號惠溪，一號東溪，浙江江山人。王守仁弟子，嘉靖二十年進士。先後任兩湖、北京監察御史。嘉靖四十一年出任河南學政，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參見蕭彥：《掖垣人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卷 14，頁 6a。

〈□忠經序〉嘉靖甲寅冬十一月朔日 後學睦樛撰⁹¹

最後跋文〈書忠經卷後〉則題「宣德九年歲次甲寅冬十一月吉旦會稽胡季舟謹識」。此刊本同蘇州府學本收錄韓陽序和胡季舟跋文，且朱睦樛序文中言此書「舊刻於吳中，歲久鏤板寢缺，侍御思齋霍公來按中州，得是編而悅之」⁹²，很可能是在前述「宣德九年蘇州府學刊本」的基礎上重刻。黃洪毗序言：

漢南郡守馬季長氏，效法義例為《忠經》十八篇……十二連城子與韓會稽所序詳矣。霍侍御思齋公，攬轡土中，適至南郡，澄清之暇，寤寐前言，慨然曰：「循良流徽，世遠未替，況言有足以起予者。……味致身勿欺之訓，以立臣紀，謂無功於聖門不可。」求善本刻之。⁹³

據此看來，類似韓陽序和胡季舟跋文，十二連城子之〈忠經引〉很可能也是為另一早期《忠經》版本所撰寫，之後被收入霍氏之重刻本中，只是其原初版本於今未見。雖然〈忠經引〉除撰者自稱「十二連城子」外，寫作時間、地域、官銜職稱皆未標注，難以考察作者身分，但其內文提供了另一條《忠經》傳播的訊息：

十二連城子過舅氏畫崗翁，出故篋馬融《忠經》一帙，曰：「漢文也，苦非善本，子有志焉？盍圖之？」乃得而環徊祈誦，携之西蜀。⁹⁴

十二連城子自其舅氏故篋得一帙《忠經》，後「携之西蜀」。此與上節引楊士奇記載《忠經》「蜀中有刻板」，應可相互聯繫。

黃洪毗、徐霽、朱睦樛序文皆明言此版《忠經》乃霍思齋在中州任上時刊行。霍思齋，名冀，字堯封，思齋為其號，山西孝義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隆慶初晉兵部尚書，編有《九邊圖說》。此書之刊行，背後或與嘉靖三十二年河南師尚詔(?-1553)之亂有所關聯。張四維(1526-1585)〈資政大夫兵部尚書霍公墓誌銘〉中言：「癸丑巡按河南，會妖賊師尚詔作亂。時撫臣以陞任去，代者未至。公多設方畧，檄諸文武將吏，乘其未定，急擊破走之，地方以

⁹¹ 朱睦樛(1517-1586)，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朱橚六世孫。明初建文帝削藩，首削周藩。周王朱橚與燕王朱棣為同母兄弟。其長子憲王朱有燾博學善書，以詞曲聞名。參見《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116，頁3565-3567、3569。筆者按：朱睦樛著《革除逸史》書靖難事，觀點有異於同時靖難史書者。

⁹² [明]朱睦樛：〈□忠經序〉，《忠經》（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

⁹³ [明]黃洪毗：〈重刻忠經序〉，同前註。

⁹⁴ 十二連城子：〈忠經引〉，同前註。

寧。」⁹⁵王崇古(1515-1588)記載霍冀擔任御史巡按河南時，「中州適人盜起歸德，破城掠邑，遠近騷動。公授策督兵剿平之，劾養亂撫臣，奪其官，遜功不居」⁹⁶。中州盜起歸德，所指即師尚詔事。兩段文字皆提到，在撫臣離任無主事者的情況下，霍冀指揮文武，謀劃方略退賊的做為。此時霍冀方中年。之後以其理政、軍事才幹，復當嘉靖朝邊域多事，霍冀先出撫寧夏三年，後督軍陝邊，「內修險固，導水利，豐積儲；外勵兵勇，繕甲利械。……督兵出邊……虜畏莫敢近塞」⁹⁷，隆慶二年晉兵部尚書。

霍冀刊刻《忠經》與師尚詔之亂聯繫多深，目前難以測定。但進入嘉靖朝後的《忠經》相關材料卻不時透露此經之刊行、使用與當時軍事文化的關係。隆慶二年襄國趙孔昭校刊本，校刊者趙孔昭(1518年後—1583年前後)，雖然官位不如霍冀，但兩人為同年進士，經歷上亦有幾許相似之處。趙孔昭，字子潛，號玉泉⁹⁸，邢臺人(今河北邢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鄆陵知縣，清慎明敏。出任監察御史，巡按遼東、福建、兩浙，以風紀凜凜，不畏權勢，樹立政聲。特別是在兩浙時，適逢倭寇猖獗，趙孔昭嚴正監督當時親附權相嚴嵩(1480-1567)的胡宗憲(1512-1565)和趙文華(嘉靖八年進士)，且彈劾後者，不假顏色⁹⁹。之後巡撫宣府等地，多兼「贊理軍務」。隆慶二年刊行《忠經》時，趙孔昭二度巡撫江浙；萬曆元年巡撫山西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公徧歷險隘，指畫方略，每秋防未嘗解嚴也。……尋奉詔以右司馬原官協理

⁹⁵ [明]張四維：〈資政大夫兵部尚書霍公墓誌銘〉，《條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51冊)，卷26，頁17b。

⁹⁶ [明]王崇古：〈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思齋霍公墓表〉，焦竑：《國朝獻徵錄》，卷39，頁109a-111a。王崇古與張四維皆出身山西鹽商世家，王崇古為張四維舅父。此外，霍冀與李開先(1502-1568)亦有交遊，《李開先全集》中可見為霍冀父母、祖母題詩共數首，或與霍冀出撫山東的經歷有關。

⁹⁷ 同前註，頁109b-111a。

⁹⁸ 不像霍氏刊本序跋篇目較多，此刊本僅附韓陽序，以及署名「玉泉山人識」的〈刻忠經後言〉。玉泉山人，筆者目前尚未能考出其身分，疑其出自趙孔昭「玉泉」之號，乃同一人。

⁹⁹ 見張四維：〈送少司馬玉泉趙公奉召還闕序〉，《條麓堂集》，卷22，頁10b-12b。[明]王世貞：〈少司馬趙公傳〉，《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卷77，頁9a-14a。佚名：〈兵部左侍郎趙孔昭傳〉，焦竑：《國朝獻徵錄》，卷41，頁13a-15a。藝術史家在仇英《抗倭圖卷》中也辨識出胡宗憲、趙文華、阮鶚、趙孔昭四文臣。見馬雅貞：〈戰動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第17期(2011年12月)，頁80-83。

京營戎政」¹⁰⁰。霍冀與趙孔昭皆北人，進士出身，在擔任御史巡按任上樹立政聲，展現其籌劃軍務之才，爾後受拔擢提督北邊軍務，呼應學者已觀察到明中葉以來文人涉入軍事的現象¹⁰¹。

除了刊刻，嘉靖之後尚有戚繼光(1528-1587)將《忠經》列入將士培育的必備讀物。

今之練將者如何？戚子曰：「無分於武弁也，無分於草萊也，無分於生儒也，遴其有志於武者，羣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明其忠義足以塞於天地之間，而聲色貨利足為人害者，必正其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白文、《武經七書》……毋牽章解，不專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庸有諸身乎？其理果得於心乎？」¹⁰²

遴選將才，無分出身文科武舉、士人布衣，戚繼光認為皆可透過訓練教育，養成良將；其培育步驟之首，即在忠、孝之德，故置《孝經》、《忠經》於諸書之首。且此處戚氏所言之「讀」，並非知識性的閱讀，而是體會、內化性的閱讀：正確理解文意之後，「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而這樣以身體領會忠孝、忠義之德為主腦的教學次第，有其特定欲意對治的問題，即「聲色貨利足為人害者」。戚繼光在同一篇文章前部，針對普遍觀念認為軍事將領乃「材官」、「藝士」，帶兵屬專業技術，未必須涉及道德人品¹⁰³，已提出強烈辯駁：

夫人無二身，則文武無二道。材藝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至於多才之徒，或巧為身謀，或明習禍福，用之自私，雖良、平之智，孔明之

¹⁰⁰ 參見佚名：〈兵部左侍郎趙公孔昭傳〉，頁14b。《明世宗實錄》，卷435，頁1a，「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戊午朔」條；卷467，頁1a，「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丙午朔」條；卷512，頁1a，「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丙辰朔」條。《明穆宗實錄》，卷22，頁9a，「隆慶二年七月乙丑朔」條。《明神宗實錄》，卷8，頁10a，「隆慶六年十二月壬申朔」條。末條《明神宗實錄》記載：「山西撫臣趙孔昭疏薦遺才尚書霍冀……。」又，張四維分別為霍、趙撰文，可見二人不僅皆刊行《忠經》，政務和交遊亦交集。

¹⁰¹ 王鴻泰：〈文武交際：明代文士武人的勢力消長、交往關係與知識流通〉（中央研究院明清推動研究委員會主辦之「201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2月5-6日）。

¹⁰² [明]戚繼光：〈儲將〉，《練兵雜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8冊），卷1，頁6b-7a。

¹⁰³ 「或者曰：『為兵之將者，材官也，藝士也，藝而材，將職理矣。使貪、使詐、使愚，皆可也。子專以心言，毋涉經生迂談乎？』」同前註，頁5a。

術，我何所賴？¹⁰⁴

材藝再高明的將士，若無德行則難以仰賴。忠誠為公，是良將必須具備的道德基礎要件；「用之自私」，為聲色貨利所引誘，在戚繼光的認識中，是良將之道德養成，必須防範的首要問題。

此理看來淺明。但倘若我們留心觀察，便可發現戚繼光之見，在其時官員士人間，當非孤立。較早曾在寧王宸濠之役中建功的唐錦，其所撰〈忠經引〉從反面論說刊刻《忠經》的必要，言：「禮義之教不明，而利欲汨之耳。」即是期待透過《忠經》之教，使人免於陷溺利欲之中。前文提到的霍氏刊本中黃洪毗〈重刻忠經序〉，除了敘述霍冀刊刻此書的緣由，其對《忠經》的主要闡釋，亦是從此書之教有助於「拒私」出發：

孟子以能言距楊、墨，為聖人之徒。楊氏為我，流於無君，能辭而闢之，即可與速肖者列。季長此編，寧非距楊、墨班乎？¹⁰⁵

黃洪毗沒有直接使用「私」一字，而採用了「為我」一詞，因為這裏他所關心「私」之弊害，回到了君臣關係的框架下考慮，「為我」的後果即是流於「無君」。無論是戚繼光、唐錦或黃洪毗，三人皆強調節制私慾，盡己為公的必要，不同的是，由於黃洪毗直接就君臣關係言「忠」，便無法回避前文所論，朱慎庵、朱永仁、徐需嘗試處理的「君尊而不親」、「親邇君遠」的問題。於是黃洪毗一方面稱許《忠經》「距楊、墨班」的作用，期勉讀者不可忘君；另一方面亦直言承認「夫遇主殊時，立功之途不一，自靖自獻，盡其心而已」¹⁰⁶。他舉例如天地之氣有否泰消長，子事父父未必賢，人臣事主依據時勢，盡忠之途亦有所不同，「邁昌期而稱良濟，大蹇而抗節」¹⁰⁷。

既然承認了君主未必賢明，黃洪毗為何仍執守人臣不可忘君，不可流於無君？黃氏的論點建立在對《呂氏春秋·務大篇》言論的思考與修正：

呂文信訓「為臣」嘗曰：「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後各得其所樂。」夫量度細大以圖其安樂，是岐而二之也，雖勝於燕

¹⁰⁴ 同前註，頁 5a-5b。

¹⁰⁵ 黃洪毗：〈重刻忠經序〉，《忠經》（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

¹⁰⁶ 同前註。

¹⁰⁷ 同前註。

雀之智，固間於天性之親矣。¹⁰⁸

此處所引《呂氏春秋》段落，原文中乃承接孔子「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之說而來。孔子先舉例如梁上巢中之燕，母子相哺自樂，而不知灶將決、屋將焚；人臣享爵祿富貴，父子兄弟一家安樂，而不知社稷危。然後提出必須「細大貴賤交相為贄，然後各得其所樂」，亦即個人、家、國的安定必須相互仰賴，方能各得安樂。在此基礎上，黃洪毗警惕過於量度、區分「細大」，「是岐而二之」；換言之，過度區分君臣之別，便是忽略了君臣原是共謀社稷福祉的一體關係。可說黃氏拒斥為我無君之念，仍是回到「忠」觀內「公」的意涵立說。國君或非明主，臣道或許艱難，但人臣卻不可因此而卸責，放棄雙方原當共同撐持的社稷公利。

整體而言，明代中期《忠經》序跋文字，多從不同角度為《忠經》「馬融僭擬」之說解套，儘管此經的作者身分略有瑕疵，但不減其重要性，可見《忠經》所涵納之義理，在當時有其效用，如軍事將領之道德養成。而效用又聯繫到序文作者們觀察到的某些政治困境，包括君主位尊而難親的君臣之隔，臣下吏員在實際社會場域中面對的聲色貨利之誘，而引發識者欲透過《忠經》倡導「拒私」的期待，並思索如何在非理想的環境中實踐「臣道」。

《忠經》作為教化的工具、施政的助力，這樣的觀點至晚明仍然持續。萬曆年間王之緒¹⁰⁹撰〈重刻孝忠經後序〉，雖然此刻本今亦不存，序文內容仍為我們提供了大量訊息。王之緒提到，此書刊行於廣西太平府，當時知府蔡迎恩¹¹⁰有見於太平府之學政亟待整飭：

因出所携《孝》、《忠》二經，示屬吏王之緒曰：「太平書肆，不鬻《孝經》、《小學》，童子讀《千字文》、《三字經》，遂讀《大學》。夫不先其本，何以從入，教之弊也。業已寓書臨海，取家藏官本《小學》，未及至，

¹⁰⁸ 同前註。

¹⁰⁹ 王之緒，雲南臨安人，舉人，萬曆三年任廣西太平府知州。《（雍正）廣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6，頁21b。

¹¹⁰ 蔡迎恩，雲程孫，以祖恩任廣西太平府知府。《（康熙）臨海縣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卷6，頁35a。蔡雲程（1494-1567），字亨之，號鶴田，臨海人，潮子。嘉靖八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年七十四。有《鶴田草堂集》傳世。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812。

今且以是帙校而梓之。¹¹¹

此段文字提供朝廷官員赴任地方時隨身攜帶「《孝》、《忠》二經」一例。從中我們也得知蔡迎恩致信浙江臨海，自取家藏官本書籍，提供地方學校刊刻使用的做法。序文隨後記錄蔡氏言談間賦予《忠經》的定位：

〔蔡公〕既而曰：「《忠經》不當與《孝經》並，但漢人手力其所□為說，如『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數言，與孔子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以孝事君之旨相發……。」¹¹²

蔡氏同意《忠經》地位並不同於《孝經》，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所特別標舉之《忠經》內文即為前文所論，遭朱鴻批評的〈保孝行章〉，然蔡氏不以《忠經》悖離《孝經》，反認為前者可與後者之旨相發。且《忠經》十八章「反覆論臣之義詳懇明備」，倘學者自幼習之，往後為臣事君，其助益非習《千字文》、《三字經》可比擬。是故《忠經》雖為僭擬，但為忠、論忠之說不可輕棄，是書不可廢。王之緒承此論，進一步從「時」與「言」之變，理解馬融之僭擬說：

道本一原，世變則二。唐、虞言中，孔子言仁，春秋戰國亂賊奸紀，楊、墨塞路，孟子始言仁義。秦漢而下，彝典不明，馬季常為《忠經》以扶之，若以補孔子之遺。其實孔子未嘗遺之也，在季長蓋有不得不言忠者矣。¹¹³

王之緒視道原本一，但隨時間世道變化，論道的語言、命題必須隨之調整。故馬融《忠經》雖非全出於聖人之言的正統經典，但在闡發一原之道以利後學的作用上，仍具價值。是歷史時空的變化，使《忠經》對於孔子之道的詮解成為必要。

四、《忠經》作為文化商品：叢書、故事與插畫

晚明除了《忠經》的政、教功能持續作用外，此經的刊刻相較於前代最突顯之處，在於更明顯加入商業因素。從宣德蘇州府學刊本，歷嘉靖霍氏刊本、益藩刊本，到隆慶趙孔昭刊本，我們大致可以觀察到，這些刊刻者非藩王即名宦，且

¹¹¹〔明〕王之緒：〈重刻孝忠經後序〉，〔明〕蔡迎恩編纂：《（萬曆）太平府志》（明萬曆五年刻本），卷3，頁283-284。

¹¹²同前註。

¹¹³同前註，頁283-284。

史料中皆可見稱譽其人品政聲的記載。刊本序跋文作者，則多為與刊刻者來往之吏員。但同樣在嘉靖年間，另有才人、藏書家顧起經¹¹⁴ (1515-1569)，將《忠經》納入其所刊行之叢書《小十三經》中，以《忠經》為諸經之首，其他依序為《女孝經》、《佛說四十二章經》、《風后握奇經》、《耒耜經》、《丸經》、《五木經》、《胎息經》、《黃帝宅經》、《黃帝授三子玄女經》、《青烏先生葬經》、《墨經》、《通占大象曆星經》。可見到了嘉靖末期，《忠經》的刊行逐漸開展，不但常見與其他儒家經典合刊，也在《小十三經》這樣輯儒、釋、道、雜藝典籍的叢書中出現。嘉靖四十一年(1562)顧氏祇洹館刊行《小十三經》當中所收《忠經》，正文前附馬融〈忠經序〉，後附顧起經題文一篇及宋代王安國(1028-1074)〈忠經後序〉。顧起經收《忠經》入《小十三經》，標誌著另一種呈現、看待此書的方式。相對於前文所檢視之《忠經》刊本多收錄同時代士人官宦所題序跋，著重從政教功能理解《忠經》，顧起經選擇附錄前代，而非當代作者之序跋文字，透露出身為藏書家，有別於官員臣僚的關注。王安國〈忠經後序〉，筆者見於收藏在臺灣國家圖書館之南宋末期刊本¹¹⁵，於顧起經之前明代《忠經》各版本中則未見。顧起經附入王安國的〈忠經後序〉，當是有意藉此篇宋人序文提升《忠經》作為藏書的價值。顧氏本人的題文，其旨亦不在論忠，而在列論前代書目記載，討論馬融作《忠經》一書的可信度。關於《忠經》的作者、流傳問題，顧氏並未逕下結論，而是提出多種可能的推測，最後期冀方內藏書家能刊刻其藏書，如此既可保存並能流通前代文獻訊息¹¹⁶。可見藉由刊刻保存前代著述，透過圖書知識提升藏書價值，確立叢書編選特色，應是顧起經編刊《小十三經》的著重點。

《小十三經》據筆者所見，收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之嘉靖四十一年顧氏祇洹館刊本善本膠片，並無置於整部叢書之前的總序，因此僅能就《忠經》前後所附之序文及顧起經本人的題詞，推測其編輯策略及意圖。在《小十三經》刊行之後五年，由沈津（生卒年不詳）於隆慶元年(1567)刊刻的《百家類纂》¹¹⁷，也收入了

¹¹⁴ 顧起經，字長濟，又字元緯，號羅浮外史，無錫人。嘉靖國子監生，廣東鹽課副使。用「奇字齋」名稱刻書。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16。

¹¹⁵ [宋]王安國：〈忠經後序〉，《忠經》（南宋末期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¹¹⁶ [明]顧起經：《忠經》（明嘉靖四十一年顧氏祇洹館刊本《小十三經》，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膠片），頁11a-b。

¹¹⁷ 沈津輯：《百家類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7-128冊）。全書四十卷，收錄包括《忠

《忠經》，當中可見兩篇分由張時徹¹¹⁸ (1500-1577)、張思忠¹¹⁹ (生卒年不詳) 所撰之〈百家類纂序〉、〈刻百家類纂敘〉，以及沈津自著之〈百家類纂凡例總序〉，有助於理解從叢書編刻的角度，時人如何看待《忠經》一書。透過這幾篇序文、凡例，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幾點觀察。其一，儘管《忠經》一書以「經」名，《百家類纂》之編者及序文作者實則以子書視之，且多方強調蒐羅刊刻子書之必要。如張時徹言：

百家之言……言人人殊，其于紓指揆道，一也。陰陽之玄秘，百物之精英，極天蟠地，蓋罔不備焉。帝王用之以平章天下，聖人用之以範圍三極，儒者以之淑躬，文人以之流譽，策士以之宣奇，法家以之明術，方外以之養真，戎行以之制勝，莫非師也，莫非學也。自非博綜古今，羅萬有於寸赤，其何以參兩天地，盡神化之用哉？¹²⁰

此段文字從兩方面指出「道」與「百家之言」的關係。一方面，雖然各家之說「言人人殊」，但就試圖把握、陳說「道」的內涵而言，其言說的目的是一致的。而正因百家之言作為知識整體，涵蓋廣泛，內容豐富，因此用途多方，帝王聖人乃至方外戎行，皆可得益於百家之言。反過來說，既然「道」的殊相分見於「百家之言」當中，學人倘欲盡可能完整把握「道」的整體，便必須將「百家之言」納入其知識、思考體系。依張時徹所言，「陰陽玄秘」、「百物精英」都在百家之言中，而如《百家類纂》這樣的叢書，正是「羅萬有於寸赤」，可便利學者泛覽古今之學的最佳載體。張思忠之言：「嘗見世之學者，抱一藝、持一能，即侈然自足。斯聞見不廣而寡陋是安，余甚病之。」¹²¹ 亦是從「博學廣識」的角度，立論《百家類纂》的價值。而《忠經》於此叢書中的位置，便是百物萬有中的一家之言。

更進一步說，上引序文不只傳達出當時以《忠經》為子書的定位，同時更涉及明代中晚期由於出版業發達，知識的生產、傳播方式與知識結構之間相互影響而

經》等諸子群書七十四部。

¹¹⁸ 張時徹，字維靜，一字九一，號東沙，鄞人。嘉靖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535。

¹¹⁹ 張思忠，字子貞，號葵菴，直隸肥鄉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和州知府，歷刑部員外郎，改吏科給事中，陞四川僉事，遷陝西副使。同前註，頁 530。

¹²⁰ 張時徹：〈百家類纂序〉，《百家類纂》，頁 1b-2a。

¹²¹ 張思忠：〈刻百家類纂敘〉，同前註，頁 3b。

產生的種種轉變。以晚明叢書的編纂來說，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對胡文煥（活躍於 1596 年前後）《格致叢書》¹²²（此部叢書也收入了《忠經》）的討論，便在四庫館臣「是編為萬曆天啟間坊賈射利之本，雜採諸書，更易名目」¹²³ 種種批評之外，提出胡文煥的出版事業，其實可以被視為晚明清初編者、出版商在「博物」與「格致」的認識論框架之下，試圖匯聚經典及實用知識於各類叢書、類書，藉此整編古今知識名物的努力。而知識內容與訊息的擴張，導致知識的分化。艾爾曼點出，胡文煥彙編事物名相的叢書刊物，已經無法再維持一個如宋代一般，以普遍原理統攝萬有，收束萬象於一的認識方法；《格致叢書》的「雜」以及分類上的紊亂，當從此一角度理解¹²⁴。《格致叢書》與《百家類纂》所收書籍固然異同互見¹²⁵，然《格致叢書》初名《百家名書》，可見兩部叢書編者的出發點近似；艾氏的討論，實亦更廣泛地適用於晚明江南其他的叢書出版現象。其他收入《忠經》的晚明叢書，包括程榮（生卒年不詳）刊刻的《漢魏叢書》¹²⁶，毛晉 (1599-1659) 的《津逮秘書》，大致皆可與此同看。

其次，作為出版市場上的商品，這些叢書的商業性，學者已有申論，筆者於此不再贅言¹²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述第一點觀察，指出的是《忠經》從普遍道德

¹²² 對《格致叢書》複雜版本的初步考察，可參見于為剛：〈胡文煥與《格致叢書》〉，《圖書館雜誌》，1982年第4期，頁63-65。

¹²³ 永瑢等：〈格致叢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第3冊，卷134，頁14a。

¹²⁴ 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hors série 2007): 140-141. URL: http://www.persee.fr/web/revues/home/prescript/article/oroc_0754-5010_2007_hos_1_1_1073.

¹²⁵ 相較於《百家類纂》以子書為核心，自初刊以後不斷改動、擴編的《格致叢書》，涵蓋益廣，包括從古至今的經典、歷史、文藝、制度、名物、訓詁、技術等著作。

¹²⁶ 收於《漢魏叢書》的萬曆新安程氏校刊本《忠經》，刊刻者程榮，晚明安徽藏書、刻書家。程榮生平資料不易考察，僅知其字伯仁，歙縣人，於萬曆二十年 (1592) 編刊《漢魏叢書》三十八種，二百五十一卷。《漢魏叢書》本《忠經》後傳入日本，內閣文庫亦見收藏。此刊本置馬融序於卷首，正文末則緊接附上「羅浮外史顧玄緯」所題文字，之後依序為宋代王安國〈忠經後序〉、明代胡季舟〈書忠經卷後〉、韓陽〈忠經序〉、十二連城子〈忠經引〉，似乎是在顧起經祇洵館《忠經》的基礎上，補入了數篇較早《忠經》序跋文字。

¹²⁷ 本杰明·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明清間帝制中國的全球商業、儒家經典和藝術品味 (1600-1800)〉，《全球史評論》，2012年第5輯，頁286-307。章宏偉：〈毛晉刻書活動考論〉，《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76-121。

律則朝向知識類目的變化；則這些叢書的商品化，便有趣地反映在編者、序文作者使用的修辭語言上。張時徹論說廣取博覽之要，以購置財貨為喻：

蓋嘗譬之人之有家也，有百金之產，則所備物百金也；有千金之產，則所備物千金也；累其產而至萬金，則其所備物不啻矣……。又譬之市者也，十家之市，則市以草衣管屨也；百家千家之市，則布帛菽粟牛羊鷄猪也；聚而至於通都萬家之市，則綺縠、珠翠、雕鏤、象貝蓋舶湊而輦至矣……。¹²⁸

在此張時徹將書籍比喻為個人財產和商業市集，將知識比喻為可以金錢購求，市集中販售的商品。個人積產愈富，市集愈大，所能蓄集的學問知識便愈豐廣珍奇。張時徹「綺縠、珠翠、雕鏤、象貝」之喻，是以物質上精緻的工藝奢侈品，比之於諸子百家各說之珍妙。沈津言：「觀諸子百家，如游羣玉之府，琮璜珪璧，瓊瑤寶璐，光明焜晃……如行衡、霍、嵩、岱之境，山輝川媚，雲蒸霞蔚……使人應接不暇。」¹²⁹也是從遊覽玉宮寶閣、山川名勝的視覺感官經驗，行銷其書刊。

以嗜好蒐羅珍本秘籍，版刻精良著稱的毛晉汲古閣，於崇禎十三年(1640)編輯、刊行《津逮秘書》共十五集，將包括《忠經》在內的顧起經《小十三經》收入其中第四集¹³⁰，可見在毛晉作為藏書家／書商的判斷中，將《忠經》定位為罕傳秘冊。其〈津逮秘書序〉更是通篇以飲食味覺之譬喻貫穿：

段柯古云：「經為大羹，史為鼎俎，子為醯醢，種種有至味存焉。」然味不貴多而貴奇，書不貴廣而貴秘。今里巷之士第求粗糲，尚一飽之無時，試嘗之以龍醬蜃醢，搗腹鱻翠，有不驚喜以為異美者耶？¹³¹

毛晉舉唐人段柯古之言，以未經調味的清淡肉汁比喻經典，烹煮之具比喻史籍，調味醬料比喻子書；一方面肯定種種書籍各有滋味，另一方面提出「味不貴多而貴奇，書不貴廣而貴秘」之論，繼《百家類纂》「羅萬有於赤寸」的行銷策略，轉而強調書籍「奇」、「秘」之貴，不再以「廣博」為號召。於是相對於如「粗糲」的一般書籍商品，毛晉以珍饈異饌如「龍醬」、「蜃醢」、「搗腹」、「鱻翠」自喻其編，並且在思忖《津逮秘書》之外當尚有許多隱而未出之罕傳舊本時，以「天廚」

¹²⁸張時徹：〈百家類纂序〉，《百家類纂》，頁2a-b。

¹²⁹沈津：〈百家類纂凡例總敘〉，同前註，頁3a。

¹³⁰原《小十三經》收入《津逮秘書》後，排列次序變化，不再以《忠經》為首。

¹³¹毛晉：〈津逮秘書序〉，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24。

突顯奇書秘典在讀者口腹身心之上的神妙作用：

予所津指，亦僅僅天廚一饜爾。然朝披一卷焉而秘，夕披一卷焉而秘，正如入招搖之山，梁有祝餘，復獲迷穀，既更不飢，且更不惑。齒牙腸胃間俱津津焉。味外有異趣，趣外有異想，快哉！¹³²

「招搖之山」、「祝餘」、「迷穀」皆典出《山海經》：在臨西海之上的招搖之山中，有草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名曰「迷穀」，「佩之不迷」¹³³。透過這個典故，毛晉巧妙地將飲食之喻，從日常物質空間轉換至遠方深山秘境，從人間桌上珍餚轉為神木仙草。如此「齒牙腸胃間俱津津焉」所傳遞的感官愉悅，同時滿足了口腹之欲與知識趣味，連結了感官與知識的愉悅追求。考察《忠經》收入晚明叢書的文化現象及其內涵，我們必須注意到叢書編者的選書、編排、行銷文字，都是將《忠經》作為文化商品而重新定位。除了是道德律則、政教輔翼，在晚明江南的叢書編纂工程中，我們也看到《忠經》成為百家學海中一知識項目，作為罕見古籍如「祝餘」、「迷穀」為讀者提供探幽訪秘的閱讀趣味，在原有的教化性、政治性之外，增加了知識和娛樂性。

晚明叢書的編纂，與科舉制度亦不無關聯。如沈俊平歸納明代中晚期制舉用書時，便將《百家類纂》納入「諸子彙編」一類之下，說明這類刊物乃「為滿足士子引經據典之需」¹³⁴。然就《忠經》而言，與科舉關係最密者，當屬晚明大量刊刻的《忠經》詳解本，這些刊本不同於明中期刊本，當中絕大多數不見新增序跋，但卻多見不同的校訂、注解者，如出版於崇禎九年(1636)的《張天如先生校正標題忠經集註詳解》¹³⁵，題由「潭陽余昌年訂」之《忠經集註》，由「陳際泰訂、熊九岳較」之《忠經集註》，由「金谿進士姚張斌訂」之《忠經集註》¹³⁶。其中，生平較可考者：陳際泰(1567-1641)，字大士，臨川人，家貧不能從師，後與艾南英輩以時

¹³² 同前註。

¹³³ [晉]郭璞傳，[清]黃丕烈校勘：〈南山經〉，《山海經附校勘記》，收入李勇先主編：《山海經穆天子傳集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0冊，卷1，頁1a。

¹³⁴ 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155。

¹³⁵ 此本現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¹³⁶ 以上幾部刊本皆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文名天下，崇禎三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年六十有八矣¹³⁷。姚張斌，字憲卿，臨川人，崇禎八年任蒼梧道政事，詞訟裁斷立辨而好學不輟，圖書外無長物，清節卓行，人咸稱之¹³⁸。余昌年生平不可考，僅知在崇禎年間刊刻經書、文集，疑為明末從事出版業之低階文人。

崇禎時期刊刻的《忠經》雖然少見新增序跋，當中不少版本起首卻附上了崇禎六年正月頒布的一篇聖諭。聖諭內容大致表達崇禎皇帝對近日貢舉失當，士風敗壞，朝廷求才困難等現象的批評和整頓之意：

至《孝經》、《小學》諸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究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今欲祇遵祖制，起敝還醇，童子必入學遇試，先查德性，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蹟，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挨論。¹³⁹

呂妙芬對《孝經》的討論，亦注意到書前載有此篇聖諭的《孝經》版本，指出：「目前日本仍藏有一些崇禎年間《忠經》、《孝經》、《小學》的合刊本……每章上面標寫該章之論旨，顯然為士子準備考試的用書。」¹⁴⁰此番描述與筆者所見崇禎年間《忠經》刊本相合，可推測這些崇禎《忠經》刊本很可能類似同時期的《孝經》，亦作為士子準備考試之用。也正是這些崇禎時期刊本，大量傳入了日本¹⁴¹。

¹³⁷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 288，頁 7403。陳際泰與張溥皆活躍於明末黨社及科考用書出版活動。見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8。Kai-wing Chow, "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1996): 120-157. 周啟榮也提到這類書籍時有書商冒稱校訂者為知名士人，託名行銷的現象。

¹³⁸ [清] 吳九齡修，史鳴皋纂：《(乾隆) 梧州府志》，卷 15，頁 1197。

¹³⁹ 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33 冊，頁 473-475。

¹⁴⁰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頁 209。

¹⁴¹ 雖然流傳至日本的晚明《忠經》版本頗多，但此經傳播之地卻不僅止於日本。朱之瑜(1600-1682)《安南供役記事》記載其於安南時見到《忠經》同《孝經》。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5 冊），卷 28，頁 27b。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朱冬芝女士提供。方孔炤(1590-1655)《全邊略記》記載萬曆元年蒙古邊事，時俺答：「願格心稱臣……遣韃韃譯者叢文光往大同，譯如《忠》、《孝經》之類。」[明] 方孔炤：《全邊略記》（《續修四庫全書》第 738 冊），卷 2，頁 104b-105a。兩百年後的歐洲，德國漢學家庫爾茨(Heinrich Kurz, 1805-1873)於十九世紀前期翻譯過數部中國典籍，《忠經》為其中之一。

《忠經》在日本江戶、明治的生命軌跡，非筆者力所能及。目前僅藉由兩部明末《忠經》刊本，與個人收藏江戶末期刊行的《繪本忠經》，略作聯繫。國圖藏有一部明末啓禎間刊本《忠經評較》（參見附錄四），題「明延陵沈鼎科較」¹⁴²。書開篇為韓陽〈忠經序〉，之後接「忠經詳解姓氏」部分，當中依序列太公（筆者按：姜太公）、田穰苴、孫武子、張良、鄧禹、諸葛亮、李靖、郭子儀、岳飛、曹彬、伯顏之名，再一一簡述諸人事蹟足以為忠者。隨後附上一段說明：

兩經〔筆者按：《孝》、《忠》兩經〕之傳世既久，但舊刊殘缺，字畫模糊，有不便於觀閱。愚性庸鄙，其於是經，雖未能而願學焉。既聞於昔之師，又辨於今之友，又訪諸名家所藏舊本，詳審較正，合二經為一書。又考諸史所載，摘取古人之能盡忠者，圖畫於卷首，欲人之開卷觸目，想像思齊，宛然如見其人。¹⁴³

這段文字緊附於「《忠經》姓氏」之後，但未題撰者何人。幾近完全相同的「《忠經》姓氏」排序、事蹟簡述和說明文字¹⁴⁴，亦見於另一題有「明陶原良¹⁴⁵詳解」的崇禎年間《忠經詳解》，現藏於上海圖書館，影印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說明文字亦不題撰者。《忠經評較》及《忠經詳解》在鄭玄注之外，皆各另有評注文字，當分別為沈鼎科、陶原良所著。然「《忠經》姓氏」究竟是否出自沈鼎科之手，抑或另有編撰者，則難以確定。

儘管如此，此二刊本中上引說明文字，卻提供了《忠經》編排形式在明末又一次變化的訊息。在諸多明代甚至更早的刊本中，我們第一次見到了如「《忠經》姓氏」插入「忠德楷模」的做法。每位歷史人物之下的短評和事蹟簡述，開始賦予《忠經》經文中的義理，具體的人物事例。特別是當這些簡述文字不只是稱揚

¹⁴²「沈鼎科，字鉉臣，江陰人。崇禎進士，仕建陽令。初至，有庫餘千金，吏曰：『此備用公費。』斥之，以補窮民逋稅，葺朱考亭、黃勉齋祠。內召行，攀轅者填塞。」〔清〕于琨：《（康熙）常州府志》（康熙三十四年刊本），卷24，頁2173。「閩應元之守江陰，奇矣、烈矣，其佐之守而死事可紀者，邑人兵部主事沈鼎科，字鉉臣，辛未進士。城陷自縊，家人藁殮之，不守而去，兵斲棺取其首。」〔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3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32冊，頁354。

¹⁴³出於明末啓禎間刊本《忠經評較》（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亦見於《忠經詳解》。

¹⁴⁴細微的差異包括《忠經評較》中的「《忠經》姓氏」，在《忠經詳解》中為「《忠經詳解》姓氏」，且不另列忠臣姓名，直接進入事蹟簡述，並在每位人物姓名之上，加入朝代。另外則是說明文字部分，《評較》作「模糊」、「較正」，《詳解》作「模糊」、「校正」。

¹⁴⁵陶原良，生平不詳，僅知於崇禎年間校刊了不少經學典籍。

形容，而是直接點出歷史人物之做為或遭遇時（如周太公歸馬放牛、諸葛亮七縱七擒、岳飛不幸遇秦檜之害），經文的思想內容似乎與特定形象化的歷史畫面、情節有了聯繫。如此，我們或可推測此刊本讀者，其閱讀、認識 (conceptualize) 《忠經》的方式，與先前僅著重經文內容的方式，便有所不同。而說明文字又告訴我們，這位編者「摘取古人之能盡忠者，圖畫於卷首」。筆者目前所見明代刊本，未見當中帶有圖畫者，不知是圖畫佚失，還是編者「圖畫於卷首」所指，即以文字描述「圖畫」？但無論如何，編者增入圖畫，目的在強化讀者「觀閱」此書時的視覺性——「想像思齊，宛然如見其人」——這點大致沒有疑問。

儘管《忠經》在晚明是否有插圖本，目前仍難確定，但纂輯倫常故事配以版刻插圖的出版品，在當時絕不罕見。元代虞韶所編，作為蒙學教材的《日記故事》，自明代中葉後出版商持續在其基礎上增補、改編、再版。目前可見最早的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熊大木¹⁴⁶刊刻本，另有歷畊老農編、朱天球¹⁴⁷注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萬曆十九年(1591)閩建書林鄭世豪¹⁴⁸刻本，張瑞圖(1576-1641)¹⁴⁹校萬曆中劉龍田(1560-1625)刊本，楊喬編、閩建劉君麗刊本（確切刊刻年代不詳）等¹⁵⁰，清代持續刊刻，而明代刊本在日本傳播尤為廣泛。汪廷訥(1573-1619)編纂《人鏡陽秋》，輯錄歷史故事，分忠孝節義四部，一傳一圖，傳入日本，經日人翻刻，易書名為《勸懲故事》¹⁵¹。另如傳本罕見，收於《故宮珍本叢刊》的《五倫圖說》，作者為一董姓庠校祭酒，書前附有萬國欽（萬曆十一年進士）〈五倫彝範前

¹⁴⁶關於熊大木的出版事業，參見陳大康：〈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其意義〉，《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頁99-113。

¹⁴⁷朱天球，字君玉，號國器，漳浦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楊繼盛就刑西市，招同志薛天華、楊豫孫、董傳策往哭之，當日有四君子之稱。萬曆中歷工部左侍郎，會南掌院缺，朝論以天球有風裁，陞都御史，仕終南京工部尚書，上疏乞休，卒年八十三。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123。

¹⁴⁸鄭世豪，建陽書商，生平不詳。關於建陽鄭氏書坊，可參考沈俊平：〈明代坊刻制舉用書出版的沉寂與復興的考察〉，《書目季刊》第41卷第4期（2008年3月），頁48。

¹⁴⁹張瑞圖，字長公，一字果亭，號二水，晉江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以附魏忠賢仕至建極殿大學士。善畫山水，尤工書，與邢侗、米萬鍾、董其昌齊名，時稱邢張米董。後入逆案坐徒，贖為民。卒年七十二。有《白毫菴集》。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543。

¹⁵⁰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191-202。

¹⁵¹繆咏禾：《中國出版通史·明代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第5冊，頁235。

敘），署年萬曆戊子（1588）¹⁵²。明末內官金忠纂輯、車應魁校梓，刊刻於崇禎十一年（1638）的《瑞世良英》，取「忠臣義士、節俠貞廉，彙而成帙」，懿行與繪圖相配，「令人一展卷，不惟誦法前人之嘉言勳行，且若相揖于一堂……」¹⁵³。其意近於《忠經評較》「想像思齊，宛然如見其人」之語。

如是，《忠經評較》一類出版品與日本江戶末期的《繪本忠經》，兩者間似乎可見一條脈絡相繫，此即故事化、視覺化《忠經》之教的傾向。《繪本忠經》裏，我們不只得見多幅江戶時期浮世繪名家葛飾北齋手筆，且當中圖文的編排，已不再是圖前文後，文字為主圖畫為輔；而是圖文相間，十四幅插圖與《忠經》文字交叉編排，試圖結合文、圖之力吸引讀者的插圖本。事實上，以《繪本忠經》為名，已標誌出此書以繪本傳遞《忠經》內容的意圖。而繪圖的內容，亦值得注意。當中首篇便以一大幅馬融正撰寫《忠經》的繪圖，圖側附上文字說明，介紹作者馬融、注者鄭玄、《忠經》出於《孝經》等基本訊息（參見附錄五）。之後的繪圖內容，則穿插中、日著名的人臣盡忠史事，中國方面包括介之推割股奉君、諸葛亮鞠躬盡瘁輔蜀、關羽棄曹操效忠劉備（參見附錄六）等故事，當中六幅以中國人物為題的繪畫，兩幅繪馬融，餘四幅中《三國》故事便占了兩幅，符合《三國演義》故事流行於江戶時期的現象。繪者處理中、日故事時，人物服裝、背景風格，亦略見區別，儘管中國「日本化」的現象仍難避免。論者分析葛飾北齋天保時期畫風，好選擇忠孝和勇武的主題，表現男性（特別是古代武士）雄健力量之美¹⁵⁴。

《繪本忠經》圖文並茂的呈現方式，明顯是為了吸引讀者。據書中開頭高井蘭山（1762-1839）〈題言〉，忠孝如車之兩輪，飛禽雙翼，此書加入名家所繪和漢忠臣圖畫，使之亦可作為教育兒童之用（參見附錄七）。書末的廣告頁也透露，同一出版商近期亦刊刻了《繪本孝經》及《古文孝經圖會》，後者同為葛飾北齋所繪（參見附錄八）。可見《忠》、《孝》二經的刊刻時常並行，在此時期的日本亦然；而《繪本忠經》吸引讀者的做法，當中還有擴大讀者年齡層的意圖。此外，《繪本忠經》選擇以訓讀而非音讀作為為經文注音的方式，而原文內的鄭玄注，亦全部直接改寫為日文（參見附錄九），在借力於圖像之外，就閱讀的聲音，又再次證明了出

¹⁵²〔明〕萬國欽：《五倫圖說》，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¹⁵³〔明〕朱統鑣：〈瑞世良英序〉，〔明〕金忠、車應魁編撰：《瑞世良英》，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輯，頁1b。

¹⁵⁴織田一磨：《北齋》，頁140。

版者推廣、普及《忠經》一書的努力¹⁵⁵。

五、小 結

考察明代《忠經》出版現象，大致可見其變化如此：首先，由於《孝經》中忠孝概念連結之深，使《忠經》即使在出身不明的情況下，依然得到重視。明初《忠經》流傳似乎不廣，考察其後幾乎大多數刊本皆可見韓陽的〈忠經序〉，我們可以推測，韓陽和況鍾刊刻《忠經》對於此書的傳播，有一定的重要性。明中葉，《忠經》的刊刻者可見從藩王名宦逐漸轉至藏書文人，以及合刊、納入叢書出版的現象。至明末，《忠經》刊本增加，商業、科舉、政治因素共同運作影響《忠經》之出版樣態。

刊刻者的身分及意圖之外，本文亦試圖透過觀察《忠經》本身形制的變化，呈現明代忠文化的動態及當中可能的複雜性。本文第二節先從《忠經》內文自身出發，分析其文字內容所蘊含的詮釋彈性。第三節考察明代中晚期士人對於《忠經》的閱讀接受，以及由此延伸及於「忠觀」的議論。這些《忠經》序跋、評論文字，或試圖調和忠孝大倫，或強調「天之立君以為民」以避免推尊君主太過，或申言君臣一體「忠者，至公無私」之意。而這些言論，除了重申儒家道德理想與理論範式，更值得注意的，還在於其背後所透露的政治場上的實際問題：君臣隔越、君尊而未必賢、人臣在公忠與私情私利之間的取捨、推揚《忠經》與明代北邊和抗倭軍事活動的關係、聲色貨利對「忠德」之實踐可能造成的衝擊。而財貨之利影響所及，並不限於政治場域，本文第四節便是透過叢書、制舉、蒙學方面的出版現象，檢視《忠經》在商業場域中，作為文化商品的另一種存在樣態。可以說《忠經》在明代具有多重樣貌：它可以是以書法藝術表現的藩府精刻本；名宦士人眼中的教化輔翼；學子應舉之用的參考書籍；出版商著意蒐羅包裝，可提供收藏、閱讀樂趣的知識商品；或是增添了歷史人物故事的通俗讀物。

在此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大致依教化、政治、商業出版三條脈絡行文，乃是為了便於組織材料與討論，三個面向其實多有交錯相涉之處。為益藩莊王朱厚燁撰寫神道碑的張時徹，同時也是沈津《百家類纂》的序文作者。益藩刊本、霍氏

¹⁵⁵關於《繪本忠經》讀音方面的觀察，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政治大學中文系林桂如教授的協助。

刊本與顧起經的《小十三經》刊刻目的頗為不同，但刊刻時間都在嘉靖後期，相隔不遠。晚明刊刻《忠經》作為科考用書頗具商業屬性，而崇禎六年頒布聖諭的政治因素，又助長了這波刊刻熱潮。追索明代《忠經》的出版現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道德理想與政治現實、商業機制不斷互動，彼此時而相濟，時而角力的過程。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忠經》的刊刻與傳播，特別是晚明商業力量促成刊刻數量增加，故事化、通俗化的趨勢，有助於「忠德」教化的推廣與普及。另一方面，唐錦、黃洪毗、戚繼光冀以《忠經》之教對治個人利欲的言論，也顯示大公與小我、君臣職分與財貨私利之間的拉鋸益形緊張。在制舉用書的市場上，亦可想見僅為科舉富貴功利性地購買、習讀《忠經》者，所在多有。我們也可試想，相較於與《孝經》或《小學》合刊的《忠經》，當此書在《百家類纂》中與東漢荀悅(148-209)的《申鑒》並列，在《漢魏叢書》中與蔡邕(133-192)記載先秦兩漢文體、禮制的《獨斷》比鄰，或是在《津逮秘書》中被放置於《耒耜經》和《周髀算經》之間，這些不同的編排與周邊知識類型的組合，是否會影響讀者對於《忠經》的接受和認識。

似乎經濟力量推動《忠經》傳播的同時，同樣的力量也拓寬了看待《忠經》的可能性，鬆動了《忠經》與道德教化之間的必然聯繫，影響著時人對於「忠德」的興趣、想法和實踐。晚明《忠經》的故事化，伴隨著《日記故事》這類圖文並置，帶有教化目的的刊物，可說為灌輸「忠德」於中下層讀者，提供了理想的載體。清初史料中記載明清易代之際殉死者，士人階層之外不乏市井常民¹⁵⁶，我們有理由揣測，這些行為背後，與忠節故事透過小說、戲曲、通俗讀物的傳播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若我們細查《日記故事》中的主題分類、數量分布，則可發現「忠」未必是最吸引當時下層讀者的故事主題¹⁵⁷。學者對於馮夢龍(1574-1646)《三言》的研

¹⁵⁶ 此類事例可見〔清〕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6，頁293-299。但市民百姓抗清或降清的選擇，與各地的經濟、治安、居民組成、清軍將領的寬嚴等實際情況關係密切，難以一概而論。相關研究可參考Frederic Wakeman, Jr.,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43-85。

¹⁵⁷ 以張瑞圖校，萬曆中劉龍田刊本為例，所分29類353個故事中（包括生知類、學知類、孝行類、友悌類、交誼類、睦族類、遠色類、清介類、儉約類、仁恩類、德報類等等），「忠德」僅占其中3類32個故事（忠諫類、忠梗類、臣道類）。而相較於《人鏡陽秋》、《瑞世良英》這類精緻的私刻本，各坊刻本《日記故事》又更能反映晚明下層讀者的消費傾向。

究也已觀察到，當中不少故事其實呈顯了不同道德條目之間的悖反，或個人情感、世俗欲望與教化目的之間的衝突¹⁵⁸。換言之，《忠經》或「忠德」的通俗化現象和教化效果，兩者間未必是簡單的因果對應關係，經典原始意涵在不同讀者群體間如何被接受、解讀，有待進一步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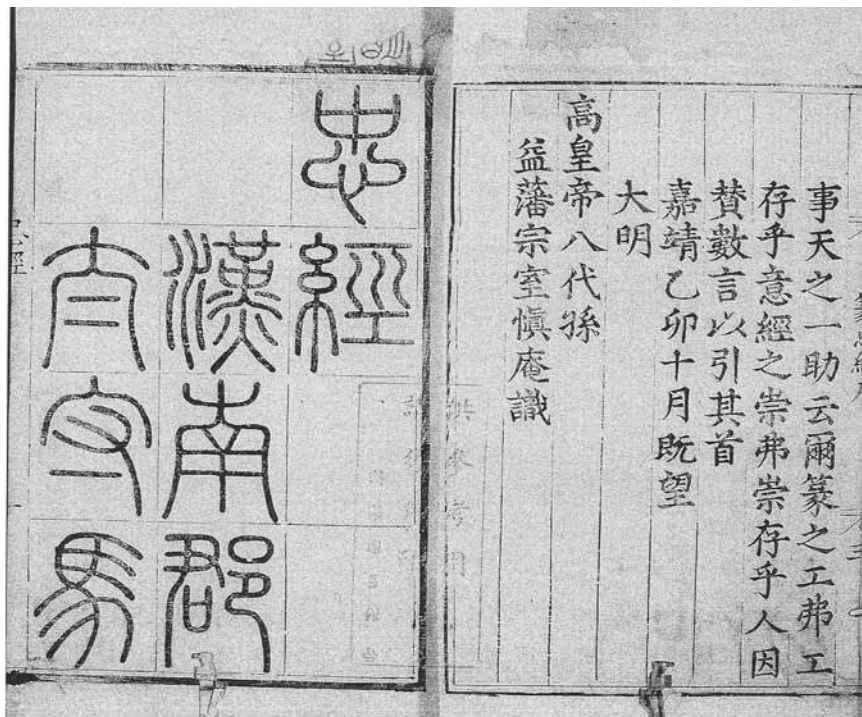
作為探索此一議題的初步嘗試，本文選擇循著《忠經》周邊的具體出版資料考察，其餘出乎《忠經》之外的忠文化現象，暫未能一併討論。但以小見大，本文整理明代《忠經》被接受、認識的過程及使用方式，已顯示時至晚明，《忠經》關乎道德、政治，也同時是知識、藝文商品，其彼此之間未必全然對立；也正因如此，構成了晚明忠文化的複雜性。而個中不同畛域交錯，各方力量互動運作的個案，有待學者進一步探究，繼續開掘這連結政治倫理哲學、商業經濟、知識生產乃至藝文娛樂的廣袤場域。

¹⁵⁸ 呂逸新：〈論《三言》的反諷敘事〉，《社會科學家》，2007年第2期，頁189-192，206。楊玲、楊天強：〈義與忠孝的悖反——《三言》中過度友情敘寫及其原因探析〉，《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2010年第7輯，頁279-288。

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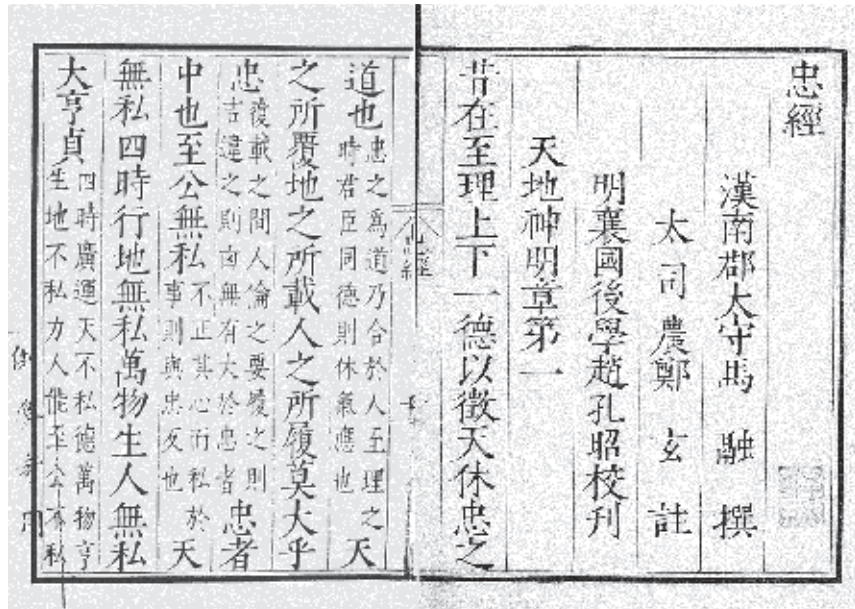
《孝經》章名	《忠經》章名	《孝經》章名	《忠經》章名
開宗明義章第一	天地神明章第一	紀孝行章第十	保孝行章第十
天子章第二	聖君章第二	五刑章第十一	廣為國章第十一
諸侯章第三	冢臣章第三	廣要道章第十二	廣至理章第十二
卿大夫章第四	百工章第四	廣至德章第十三	揚聖章第十三
士章第五	守宰章第五	廣揚名章第十四	辨忠章第十四
庶人章第六	兆人章第六	諫諍章第十五	忠諫章第十五
三才章第七	政理章第七	應感章第十六	證應章第十六
孝治章第八	武備章第八	事君章第十七	報國章第十七
聖德章第九	觀風章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盡忠章第十八

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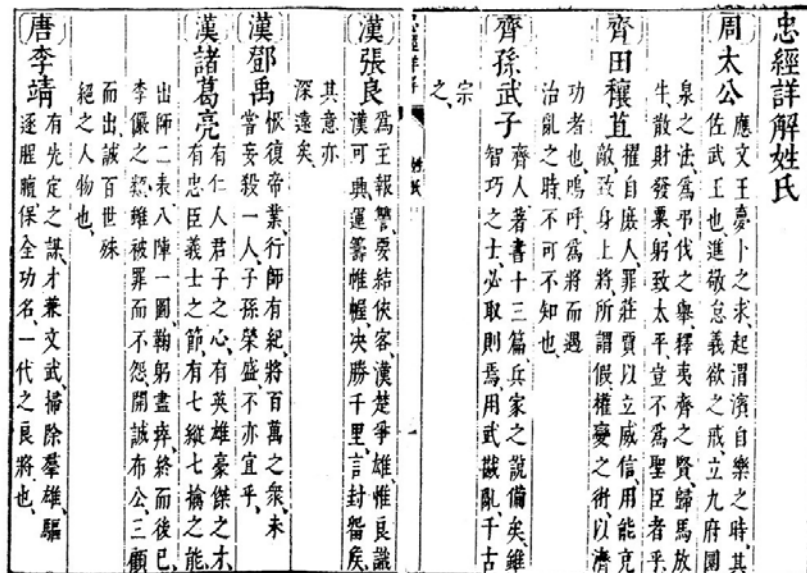
《篆孝經一卷，附忠經一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益藩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附錄三



《忠經》明隆慶二年(1568)襄國(河北)趙孔昭校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附錄四



《忠經評較》明啟禎間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附錄五



《繪本忠經》日本江戶天保五年(1834)，筆者購藏

附錄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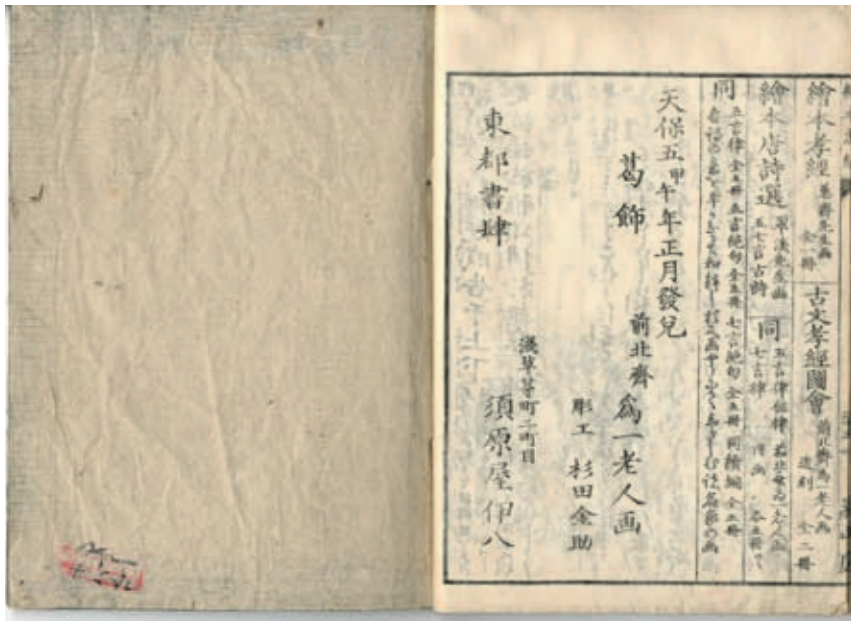
同前圖

附錄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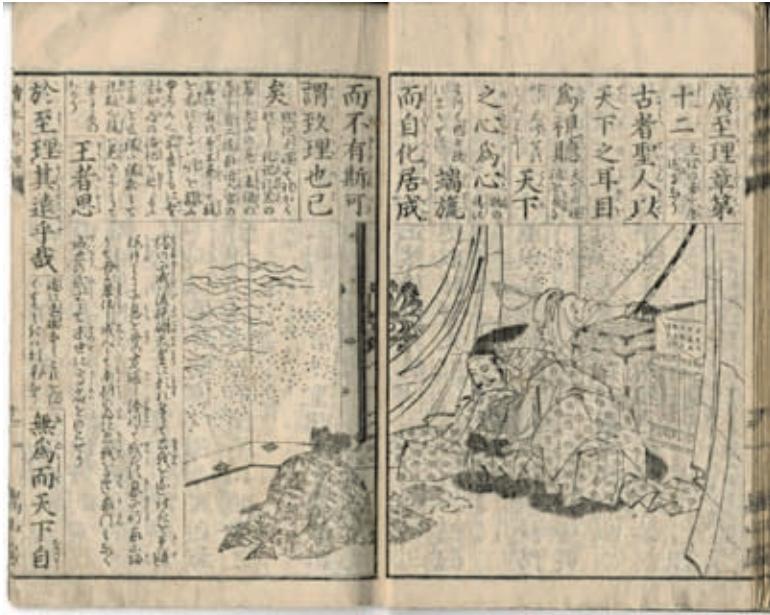
同前圖

附錄八



同前圖

附錄九



同前圖

徵引書目

- 于為剛：〈胡文煥與《格致叢書》〉，《圖書館雜誌》1982年第4期，頁63-65。
- 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王世貞：〈少司馬趙公傳〉，《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王玉德：〈論《忠經》的成書年代及與《孝經》之異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4期，頁23-25。
- 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第12期，2009年6月，頁41-92。
- _____：〈文武交際：明代文士武人的勢力消長、交往關係與知識流通〉，「201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明清推動研究委員會，2013年12月5-6日。
- 方孔炤：《全邊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方孝孺：《遜志齋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00年。
-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明清間帝制中國的全球商業、儒家經典和藝術品味 (1600-1800年)〉，《全球史評論》2012年第5輯，頁286-307。
- 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5冊。
- 朱鴻：《孝經總類·巳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1冊。
- 朱厚燁纂：《篆孝經一卷，附忠經一卷》，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益藩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 李應泰：《(光緒)宣城縣志》，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 沈津輯：《百家類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27-12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
- 沈俊平：〈明代坊刻制舉用書出版的沉寂與復興的考察〉，《書目季刊》第41卷第4期，2008年3月，頁48。
- _____：〈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27

-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155。
-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
- 呂維祺：《孝經大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1 冊。
- 呂逸新：〈論《三言》的反諷敘事〉，《社會科學家》2007 年第 2 期，頁 189-192、206。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 金 忠、車應魁編撰：《瑞世良英》，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林庭楸：《（嘉靖）江西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82-18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
- 范 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 周 琦：《東溪日談錄》，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周天爵：《（道光）阜陽縣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華東卷》第 13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 年。
- 唐玄宗注，邢 昺疏：《孝經注疏》，收入《四部備要·經部》第 41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年。
- 唐 錦：《龍江集》附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34 冊。
- 馬 融：《忠經》，明宣德九年蘇州府學刊本。
- _____：《忠經》，明嘉靖三十三年霍氏刊本。
- _____：《篆孝經一卷，附忠經一卷》，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益藩刊本。
- _____：《篆忠經》，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益藩舒城王府刊本。
- _____：《忠經》，明隆慶二年襄國（河北）趙孔昭校刊本。
- _____：《忠經》，明萬曆間新安程氏校刊本。
- _____：《忠經評較》，明啓禎間刊本。
- _____：《忠經詳解》，明崇禎間刊本。
- _____：《繪本忠經》，日本江戶天保五年本。
- 馬雅貞：〈戰動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第 17 期，2011 年 12 月，頁 80-83。

- 章廷珪：《(雍正)平陽府志》，收入《地方志災異資料叢刊》第1編第1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 章宏偉：《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王德毅增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戚繼光：《練兵雜記》，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8冊。
-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
- 張四維：《條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51冊。
-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收入《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張邦奇：《張文定公紆玉樓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36冊。
- 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曾毓璋：《(同治)廣昌縣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華東卷》第7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 郭璞傳，黃丕烈校勘：《山海經附校勘記》，收入李勇先主編：《山海經穆天子傳集成》第60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33冊。
- 陳大康：〈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其意義〉，《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頁99-113。
-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 黃俊傑主編：《天道與人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 溫睿臨：《南疆逸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32冊。
- 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舒大剛：《至德要道：儒家孝悌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
-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09-110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楊士奇：《東里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冊。
- _____等撰：《明仁宗實錄》，收入《明實錄》。
- 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楊 玲、楊天強：〈義與忠孝的悖反——《三言》中過度友情敘寫及其原因探析〉，
《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2010年第7輯，頁279-288。
- 萬國欽：《五倫圖說》，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 趙 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蔡迎恩編纂：《（萬曆）太平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 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
- 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
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
- 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思想中的情、理、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2007年。
-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 _____：《中國出版通史·明代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
- 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收入《民國叢書》第1編第22冊，上海：上海書
店，1989年。
- 蕭 彥：《掖垣人鑑》，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1期第24冊，臺北：文海出版
社，1970年。
- 顧起經：《小十三經》，明嘉靖四十一年顧氏祇洹館刊本。
-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 馬淵昌也：〈明代中晚期儒學思想中「恕」概念之定位初探〉，林維杰、黃雅嫻主
編：《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論與內在超越性》，臺北：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4年。
- 溝口雄三：〈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二十一世紀》第21期，1994年
2月，頁87-88。
- 織田一磨：《北齋》，東京：アルス，1926年。
- 齋木哲郎：〈唐代新春秋学の展開と「忠」思想〉，《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第23
卷，2008年，頁273-283。

- Chow, Kai-wing. "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 120-157.
- Chan, Alan K. L. and Sor-hoon Tan, eds.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Thought and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 Fletcher, George P. *Loyalty: An Essay on the Morality of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Kerlouegan, Jerome. "Printing and Publications by Ming Princes."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1-2.2 (2011-2012): 39-73, 105-144, 3-75, 109-198.
- Kutcher, Norman.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lial Piety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akeman, Frederic Jr.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